GRIFFITH JOHN

FOUNDER OF THE HANKOW MISSION.



WM. ROBSON

杨格非传

Griffith John, Founder of the Hankow Mission, Central China

威廉·罗布森（William Robson）著

1888年纽约、芝加哥弗莱明·H·雷维尔出版社（Fleming H. Revell）

中 文 译 本

GRIFFITH JOHN

Founder of the Hankow Mission Central China

BY

WILLIAM ROBSON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FLEMING H. REVELL

NEW YORK: 12 BIBLE HOUSE. | CHICAGO: 148 & 150 MADISON STREET.

PUBLISHER OF EVANGELICAL LITERATURE.

1888

插图目录

图一：上海茶园 16

图二：大运河上的船闸 28

图三：中国人的面孔类型 30

图四：上海街景 43

图五：中国灯笼店 52

图六：肃顺，中国的摄政王 55

图七：宣教士与归信者合影 77

图八：宝塔中的讲道——中国宝塔内部 90

图九：中国陕西省汉中府城门 98

图十：汉口水手休憩所 139

图十一：为杨格非感恩礼拜装饰的医院礼拜堂 143

图十二：汉口新礼拜堂正面 151

目录

第一章　威尔士的少年布道家 6

第二章　上海——披上盔甲 14

第三章　太平天国之乱 34

第四章　汉口布道站的建立 49

第五章　本土助手——医院建立——归信者剪影 75

第六章　三千里四川陕西之旅——迁往武昌——访英
——归来与杨夫人去世 91

第七章　文字工作 110

第八章　再婚——被异教徒用石打——被圣灵充满
——继续成功——杨夫人去世 124

第九章　疲乏却仍追赶——中国向福音大大敞开——
安然去世 147

术语表 160

人名索引 164

地名索引 171



第一章　威尔士的少年布道家

威尔士的少年布道家——于同一座坟墓前失去父亲又得着父亲——立约成为宣教士

"遥远，遥远，在异教黑暗中居住，
千万灵魂或将永远沉沦。
谁，谁愿前往，传讲救恩的故事，
仰望耶稣，不计代价？"

多年以来，基督教会一直祷告，求神使祂的宣教士得以进入中国。古老的异教手握浩瀚典籍——要掌握这些典籍，非最聪慧的头脑付出极大努力不可——因而心满意足，深信自己从外国人身上学不到什么。然而这个帝国，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傲然禁止蛮夷踏上她的海岸，忽然发现，她的铜门竟被全能者的手豁然推开。

同一位大能者也曾催促教会预备工人；当这黄金机会来到，便立刻差遣这些救恩的使者进入中国人烟稠密的城市。此后发生的事件把门推得更开，广大的内地也向宣教工作敞开。

本书旨在记述其中一位先锋宣教士的生平。他有才能、有胆识，又满有智慧。我们更愿意让读者从这里所叙述的事件中自行判断他的品格，只补充说明：这些事件应视为例证，绝非对他积极而成功的一生作全面充分的记述。

杨格非（Griffith John）于一八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生于斯旺西（Swansea）。他的父母敬虔，生活宽裕，在所属的阶层中算是中等偏上。杨格非的父亲备受尊敬，直至去世，一直受雇于维维安父子公司（Messrs. Vivian and Sons）。

一八三二年，他的母亲死于霍乱；父亲的姐妹——至今仍健在——对杨格非尽了母亲的本分。

他自幼受圣灵感动，喜爱与年长的基督徒为伍。八岁时，他被接纳为斯旺西以便以谢教会（Ebenezer）的会友；九岁到十岁之间，便在宗教聚会中出力。他第一次公开祷告时，嘴唇颤抖、泪流满面，只有一个祈求：

"主啊，藉着耶稣基督，赦免我的罪。阿们。"

十二岁时，他受雇于翁卢因（Onllwyn）的约翰·威廉姆斯先生（Mr. John Williams）——一位敬虔的人，很快看出这孩子前途可期。他邀他住进自己家中，待他如自家孩子。

十四岁时，他开始传讲福音，从一开始就显出第一流的演说天赋。人们乐意听他讲道，各教会纷纷邀请他。在拥挤的听众中，常有人说："这孩子是何等样的人？"大家对他在福音事工中的光明前途寄予厚望。

因此，当他突然退出一切公开事奉，只以谦逊的言辞解释自己年幼、缺乏经验时，众人十分惊讶。有一段时间，他以更私下的基督徒工作方式运用恩赐。后来，在较为稳重的朋友们和牧师的恳请下，他十六岁那年开始在威尔士各地讲道，果效甚好。无论到哪里，很快就显明：神正在杨格非身上预备一位为自己作见证的大能见证人；也有人预言，等待他的将是如同受人敬重的"威尔士使徒"克里斯马斯·埃文斯（Christmas Evans）一般辉煌的名声与有益的一生。

有人指出，一段系统的学习对他大有裨益，他的父亲便问斯旺西以便以谢礼拜堂的牧师雅各布牧师（Rev. E. Jacob）"可否教杨格非一点东西"。这位心地仁慈的牧师曾免费帮助其他预备作传道人的年轻人；自一八四八年十一月十

三日至一八五〇年九月，杨格非住在他家里，每日受他教导。

一八四九年，他的父亲染上了十七年前夺去母亲生命的疾病，死于霍乱。儿子在坟墓前所表现的深切悲痛，深深触动了雅各布牧师的怜悯之心，他说：只要他活着，杨格非就永不会缺少地上的父亲。这个誓言他忠实地守住了；由此建立的关系，至今双方都以感人的热忱维持着。

雅各布牧师尽心竭力地预备这位年轻的受托者，去迎接他认为摆在前面的大有用处的人生。当杨格非申请布雷肯学院（Brecon）时，雅各布牧师回答学院当局的询问，写下一系列答复，简朴真诚，同样动人。他当时对这位年轻朋友的爱与敬重，或许会使人以为他评价过高；但他一八五〇年三月所作陈述的真实性，已被杨格非近四十年来成功事奉中始终如一的高尚坚定的基督徒品格，以及陌生听众一致的见证，充分证实了。

不能尽录于此，仅记数则。雅各布牧师自称有"长期持续、最为有利的机会"观察、判断他的学生，因而有权着重发言。他说：

"就他的年龄而言，在我所认识的人中，他无疑最接近完全、成熟的基督徒。他性情温良，我从未见他发过一点脾

气。他谦卑如婴孩……随时愿意照吩咐去做他所敬重之人的要求。

"我认为他的讲道恩赐非同寻常。他的声音甜美，表达轻松流畅。照目前看，五六年之内，他将成为威尔士最受欢迎的传道人。我听过他像演说家一样滔滔不绝地讲一小时，然后在片刻之间使全场会众进入惊人的兴奋状态；不是靠空洞的辞藻，而是靠健全的见识和真实的雄辩。

"他申请学院，不是因为找不到事奉的园地。他虽年轻，在他偶尔讲道的几间教会中，几位领袖人物曾对我说：'只要能请到杨格非，我们就不想听别人讲'；但他的看法远非如此，因为他深知传道人应当心中有丰富的有用知识。

"我尽我所能仔细观察过他，事实是，我没有发现一处缺点。"

杨格非于一八五〇年九月进入学院。入学的第一个主日晚上，雅各布牧师写了一封情辞恳切的信，满是慈爱的劝勉，特别强调敬虔、持守禁酒的誓约、"避免以求爱为目的的交往"、严格遵守诺言、凡事预先思量、对接待他的人以礼相待、凡事准时；最后嘱咐："记住：你在学院是怎样的人，你的一生在很大程度上也将是怎样的人。"

与杨格非同室的约西亚·琼斯牧师（Rev. Josiah Jones）为我们阐明了最后一句话。他说，杨格非入学时"是个身材矮小瘦弱的青年，面容坦率，前额饱满端正，头发向外弯曲如华盖"。论到杨格非在布雷肯求学期间的道德品格——堪称楷模——琼斯先生说："我不记得他说过一句显露低级趣味的话，更不用说内心道德不洁了。"他还说："杨格非作为学生的主要品格有以下几点，表明他一生品格始终如一：勤奋、坚忍、有果效。"

杨格非有幸受到亨利·格里菲斯牧师教授（Rev. Professor Henry Griffith，F.G.S.）——当时学院的院长——的激励性教导。无论在数学、哲学还是神学上，格里菲斯教授都是一位能干而充满干劲的治学领袖，从不回避难题，不看到学生攻克掌握绝不罢休。

杨格非入学时，心中怀着有朝一日成为成功受欢迎的传道人的盼望；但神不容他长久怀揣这盼望而不受挑战——神亲自临到他，除去属地的雄心，代之以向异教徒作宣教工作的热切渴慕。

一八五三年三月，杨格非向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自荐。当被问到"你想作宣教士的愿望有多久了"时，他回答说，这愿望在他入学后不久就进入他心

里；虽然强度时有起伏，但总体是渐增的。为证实此言，应当说明：入学后不久，他与一位同学立下庄严的约，要作宣教士。这对这位受欢迎的年轻讲道者意义重大——从此他必须把各教会热情的邀请一概推开。其中，阿伯拉曼（Aberaman）那间重要的公理会教会的邀请，严峻地考验了他的决心。但神常用一件事对另一件事，来试验祂的儿女；正在这邀请等候答复之时，老练的宣教士、马达加斯加的大卫·格里菲斯牧师（Rev. David Griffiths）访问学院，向学生们恳切讲话，最后呼吁工人。杨格非便公开表明作宣教士的心愿与决心。

伦敦会接纳他之后，一八五四年一月，杨格非被调往贝德福德（Bedford），以便有更多机会用英语讲道。他去的时候，一位导师说："我发现杨格非先生读的书很多，我想我帮不了他什么。"

此前他心之所向，是以马达加斯加为工场。他写道："哦，要是门开了，我多么欢喜！我的心如今就在那里！"当时马达加斯加被残暴的拉纳瓦洛纳女王（原文作Banavalona）关闭，不许欧洲宣教士进入。但当有人问他是否愿意去中国时，他毫无异议，很快就为中华大地心智黑暗的亿万生灵满怀热忱。

离英之前，杨格非与玛格丽特·简·格里菲斯小姐（Miss Margaret Jane Griffiths）结婚——她是马达加斯加宣教士大卫·格里菲斯牧师之女，当时其父在布雷肯郡黑伊（Hay）牧会。再没有比这更幸福的选择了；杨夫人后来证明自己是中国妇女中一位成功的工作者。

他的按立礼于一八五五年四月六日耶稣受难日在斯旺西举行，以便以谢礼拜堂座无虚席，热情的会众毫不掩饰与这位雄辩的年轻传道人分别的强烈感情。当天下午和晚上还举行了特别聚会。次周的周四，杨格非在同一地方讲了告别讲道；之后朋友们赠他纪念礼物，以表达对这位年轻宣教士的敬重与祝福。

杨格非牧师夫妇与威廉逊牧师（Rev. A. Williamson）夫妇被派往增援中国宣教工场，于一八五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启程前往上海（Shanghai），渴望在"希尼之地"（Land of Sinim）事奉；他们听见那清晰而遥远的呼声："请你过来，帮助我们！"



第二章　上海——披上盔甲

"你忧伤受屈的漫漫长夜,
即将结束;
羞辱变为荣耀,
哭泣化为歌声。
新的清晨正在破晓,
新的太阳喷薄而出;
新的绿意含笑,
新的时代已经开始。"
——波拿博士（Dr. Bonar）

1855年9月24日，好船"米切尔号"（On Hamilla Mitchell）载着传教士们，经过一百二十天愉快而平静的航

行，抵达上海（Shanghai）。杨格非（Griffith John）来得正是时候，时机再好不过。四十年来，传教士们一直渴望并祷告，能有机会向中国的乡民自由宣讲福音。他们的祷告即将蒙应允。太平天国之乱（Taiping Rebellion）在洪秀全（Hung-sew-tsuen）率领下，已蹂躏这片国土最富庶的地区五年；与此同时，欧洲列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牵制着清廷的注意力。历代以来，这个政府一直施行强有力的保守统治，如今它的控制松弛了；通商口岸的传教士们利用统治日渐松懈之机，深入内地巡回布道。根据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treaty of Nanking），洋人只能在条约口岸一日路程之内活动。门户逐渐敞开；杨格非到达时，怀着和平目的的旅行者实际上已可自由通行各地。



图一：上海茶园

杨格非以他一贯的热忱投入工作。航行途中他刻苦学习，如今专心攻读语言，指望六个月后就能讲道。他在给英国的第一封信中写道："我心急切，渴望能向百姓讲述基督。目前我只能问他们信不信耶稣，告诉他们这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请为我祷告，使我在中国大有用处。"许多心灵回应了这一请求；我们相信，本书所记的事实必证明这些祷告已蒙应允。

在为他们预备的房子修缮期间，杨格非夫妇暂住在老传教士麦都思牧师（Dr. Medhurst）家，他四十年的开荒之劳即将结束。如同古时的以色列人，他长久渴望进入心所向往

的美地；前一年，他已能到上海周边乡间作几次布道之旅。他的赏赐近了，其中一部分就是得知：晚年陪伴在他身边的这个人，是上帝预定要把福音带到中国中部和西部各省的。当时上海住着二十五位传教士，分属英美各差会。他们都热忱欢迎新来的人，新人很快便与宣教禾场上的同工们亲如一家。1856年1月，年轻传教士因儿子的出生而满心欢喜，为他取名格里菲斯（Griffith），不过人们通常用他的中文名字美福（Mei-foh）称呼他。

同年6月，杨格非谦逊地谈到他最初的直接努力："几个月来，我习惯去庙宇、茶馆等地分发单张，用我朴拙的方式讲道。现在我能颇为轻松流利地讲半小时到四十五分钟。令我十分欣慰的是，我发现大家很能听懂我。说中文，能被听懂是大事，因为声调太要紧了——声音稍微一升一降、一长一短，意思就天差地别，哪怕用罗马字母（Roman character）拼出来完全一样。这使口语的学习既枯燥又艰难。书面语更是个庞然大物。它确实难学——至今没有一个欧洲人真正掌握它，可见一斑。我非常喜欢学它，一点不觉得枯燥。它的难处只会激起我与之搏斗的渴望，直到把它踩在脚下。征服这门语言，值得一场漫长而刚强的奋斗。有谁会觉得学一门语言是重担呢？按上帝的护理，这门语言注定要成为管道，让神圣真理如赐生命的溪流，流入四万万干渴

却不朽的灵魂。这样的念头，足以唤起人全部的生命力。还有什么比这更高贵的目标、更崇高的结局，值得人把灵魂全部的能力才干全然献上呢？上帝在灵魂得救上得荣耀，是天下最尊贵的工作。"这可视为杨格非在中国一生工作的基调。

几个月后，他随艾约瑟先生（Mr. Edkins）等传教士作了几次布道之旅，每次外出两三周，深入内地一百五十英里。他说："我们得以接触几百万最麻木、最冷漠、最属世、最不敬虔的人。"

1856年下半年，上海周边数月大旱，起初官民都极虔诚地向偶像求雨。雨不来，百姓便停止了祭祀，说偶像无用。和尚道士们列队庄严游街数日，依然徒劳。百姓转而轻蔑地议论他们，倒似乎愿意听传教士讲道，也能体会他们的苦心。唉，雨一下，他们很快又沉回先前的冷漠。

此前杨格非都是随年长的传教士出门布道；1856年10月31日，他第一次独自远行，只带了售书员（colporteur）王某（Wong）作助手。

他们访问的第一个重要地方是松江大城（Swong Kong），距上海四十英里。当晚在城下四英里处抛锚过夜；次晨醒来，杨格非发现船正驶入城西门。正值年度考试，求取功名的士子挤满街头，无论传教士和助手在哪里布道，都

能得到聪明的听众。他们带的书很多，被争相索取。无人表现出不悦或恶意。

下午，他们边走边分发书籍，王某递给一位体面人一本，那人看了看封面，竟把书撕得粉碎。王某大为狼狈，高声责备那人：不喜欢，大可把书退回，何必撕毁。杨格非看得目瞪口呆——他分发过成千上万的书籍单张，从未见过这种事。周围的人见传教士为这前所未闻的无礼举动动了怒，忙劝他们别生气，说那人是天主教徒（Roman Catholic）。

劳累一天后，杨格非和助手回到船上，把船夫们聚拢来，和他们一起读新约圣经，讲解并祷告。他说这是全天最幸福的时刻。第二天是主日。唉，在中国没有安息日。和平时一样，只有喧嚣、忙乱、骚动、混乱和不敬虔。不过，传教士们面对举人听众，人数更多，也更专心。

次日他们返回上海。杨格非染上了发烧并发疟疾（fever and ague），幸得合信医生（Dr. Lockhart）及时有力的治疗，很快痊愈。

在乡间如此奔波的同时，杨格非和他能干的妻子也没有忽略自家周围的人。他们雇了一名女仆，对上帝、救主和来世一无所知。杨夫人每天教导她，杨格非在家庭敬拜时也有机会对她讲道。她渐渐迫切地想认识真理，感受真理赐福的

感化。她不久便渴望受洗，和两个孩子一同被接入教会，后来证明自己是教会中名副其实的一员。

早在1857年9月，杨格非就计划深入内地，到洋人势力不及之处，为百姓的灵性福祉劳苦。但时机未到，他仍留在上海，读书做工，立志作"无愧的工人"（提后2:15）。他告诉朋友们，两年的居留纠正了他对这工作的估计，也让他看清了福音在中国前行的巨大难处。他说："圣工在推进，但非常缓慢。百姓的心硬如钢铁。他们的灵魂和身体都被世界吞噬，似乎感觉不到感官之外还有什么真实。我们的道理在他们听来是愚拙，我们的话是胡言乱语。我们与他们辩论，把他们驳倒；我们用道理使他们哑口无言、羞愧难当，但这一切落在他们身上，如同雨落在沙漠上。有时我几乎以为中国没有指望了，但有一个应许驱散了阴霾，就是：从希尼之地（Sinim）来的人必要来到。中国几千年来所听从的师傅们，所教的不过是今生的事。孔子（Confucius）论礼、义、信、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说得极好，但他说：'敬鬼神而远之。'中国人实践这句话的办法，就是尽量少想他们。"

1857年10月，杨格非与艾约瑟牧师（Rev. J. Edkins）访问苏州（Soochow），中国人视之为最富庶美丽的城市之一。俗话说，人生要幸福，须生在苏州，住在广州，死在苏

州——苏州人最俊，广州货最奢，苏州棺材最好。苏州在上海西北；城墙周长十二英里，城内约有一百五十万人口。此前从未有洋人公开到访过这座城市。传教士们刚进城门，就被一位官员很有礼貌地请进屋里坐下。约两分钟后，又来了一位级别更高的官员，盘问了一番，然后说不能允许他们进城。他们与他理论，他说："好吧，这道门你们过不去，不如换道门试试。"见再争无益，他们回到船上，吩咐船夫从一道水门进城。顺利进城，游览了主要的名胜。又向许多人讲了道，然后回到船上，对这次成功十分满意。他们的出现引起很大好奇，但无人滋扰；于是次日他们深入城中心，分发了数百本新约圣经。

此后杨格非几乎专心巡回布道，走访了许多城镇。1858年初，他与一位同工访问了嘉兴（Kia-hing）和嘉善（Kia-shan）两座大城，距上海约一百英里。他们决定改变一天讲两三篇长道的惯例，改用简短朴素地陈述福音真理、恳切慈爱地呼吁听众良心的方法。每次只讲几分钟；他们清早开工，两人分头讲到深夜，一连数日，两座城里几乎每条街、每个街角，都有几千人头一次听到这佳音。群众听得很专心，无人打断，也无人表示恶意。许多人似乎被感动，但大多数人对这信息漠然置之，甚至轻蔑。当时杨格非表示，他深信那种旧观念——中国必须先从上层做起，先得着智者、

富者、贵者，再下及平民——是完全荒谬的。他指出，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的经验都证明，中国并不例外于这条普遍规律。他说："若要使中国归主，必须从平民做起，把精力主要用在开启他们的心窍上。"

1858年3月29日，杨格非携全家离开上海，前往平湖（Ping-hu，意为"平安之湖"），约二百华里。他们在城外租了一所房子；那年夏天，他大部分时间住在那里，每天向很好的会众讲道。成立了由六位慕道者组成的慕道班，后来建立了教会。他的计划是在上海附近各城设立同样的站点，巡回其间，督导华人助理传教士和各项工作。

他的眼目和心很快转向杭州（Hang-chow）——"中国的雅典"，次月事态的发展使他得以成行。4月19日，他携全家出发，次日晚抵达松江（Sung Kiang），第三天早晨拜访了华人助理传教士的住所——"锡安堂"（Zion House），教会成员已聚集在那里。几位女性慕道者听说杨夫人同来，也聚了过来。当时中国的社会风气，认为女子见陌生男子、尤其是洋人，极为不妥。但杨夫人在场，打消了一切顾虑，这些好妇人便欣然上前，公开承认信耶稣。

杨夫人进屋时，一大群人跟了进来，能挤进客堂（ka-dong）的都挤了进去，围坐在她周围。主人夫妇无法约束众

人的好奇心，杨格非只得出去劝大家安静。他回来时，客人们已坐下吃水果、糕点、喝茶。食物盛在盘中摆上桌，却没有分食用的小碟。女主人用手取了食物分给客人，直接放在桌上——桌子不算干净。吃完后撤下桌子，用一张纸擦了擦。

杨格非考问了女性候选人，合格的便施洗接入教会。其中一位是被太平军杀害的官员的遗孀。另外两位是一对母女，女儿的婴儿也一同受洗。她的丈夫几个月前已加入教会。接着杨格非在隔壁房间为男士主持聚会，五人被接纳为会员。与此同时，妇女们正细细打量杨夫人。有人说杨先生（Yang-sian-sang）的妻子漂亮得多。有人觉得杨夫人一定很能干，另一人则被她头发的光滑吸引，赞不绝口。大家一致认为她上海话说得很好。这番议论一直持续到男士聚会结束，传教士们离开。

他们在平湖过了主日，周三抵达杭州。次日他们游览西湖（Si-hu），恰逢观音（Quaning）菩萨的诞辰。路上看见好几条船满载着拜完观音归来的香客。这里是佛教最兴盛之地，有些香客跋涉二百多英里来参加法会。湖近圆形，杭州城沿东岸展开，对岸是群山，山间点缀着许多佛寺，据说拥有中国最美的风光。湖中有座风景如画的小岛，以长堤与城

相连，供人散步。这堤是诗人苏东坡（Su-tung-p'o）所筑。站在岛上的亭子（Tang-tsi）里，能听到对面山上传来奇妙的回声。说几句话，便听得清清楚楚地重复回来。

他们雇了一条游船，参观净慈寺（Tsing-tsel-zz'l），寺中有五百尊真人大小的镀金罗汉像（Sohangs），其中有几位是本朝已故的皇帝。帝王罗汉头顶悬着宝盖，以示区别。寺附近是名将岳飞（Yo-lan-ye）之墓，他曾大败金兵（Kiu Tartars），把他们赶过黄河以北。仇敌设法将他召回，在狱中把他杀害。阴谋之首是秦桧（Tsing-keno），其后人绝不踏入杭州城——他的跪像至今还摆在那里受辱。传教士们还参观了天竺寺（Tian-tso）大丛林，住着五百僧人，颇感兴趣。山间通往寺院的宏伟石道上，挤满了各色乞丐：瞎子、哑巴、瘸子，许多人露出溃烂的伤口以博同情，一边呼求佛祖保佑，一边死缠着游客讨钱。

灵隐寺（Ling-zin）中有一座大殿，殿内一方厅，光线布置得恰到好处，每排五十尊真人大小的镀金罗汉都沐浴在同样明亮的光中。僧人们颇以他们的斋堂为傲，里面有三口巨大的铜锅，一口就能煮出一千六百人吃的饭。殿对面山岩中有一石窟，也辟作佛殿。窟壁上刻着各种佛像。和尚指着墙上一个小圆洞，说能从那里看到佛头。传教士们却怎么也

看不见。想必是缺了看这奇景所需的信心。那里还有一口池塘，养着几条蛇。杨格非问和尚为什么不把蛇打死。和尚大吃一惊，说："我若杀了其中一条，说不定就杀了我的祖父。"前一年，几位传教士到访过这处佛教圣地，与几位最有学问的僧人谈论过基督教的本质与主张。一位方丈恳求他们不要反对旧教，而把基督教说成与佛教并行不悖，而非势不两立。他以此为条件，邀请他们在宏伟的寺院旁建一座教堂。

杭州这座大城有一百多万人口，数省商贸荟萃于此，促其繁荣。他们取道返回松江，沿途经过许多地方，讲道并分发单张书籍。此地有三位妇女和三个孩子等候受洗，小教会的光景令传教士们大得鼓励。这次巡回大获成功，一行人于1858年5月14日回到上海。不要以为杨格非的时间主要花在看稀奇景致上。在杭州和别处一样，他坚持不懈地讲道、分发单张书籍，为这座美丽城市日后的宣教工作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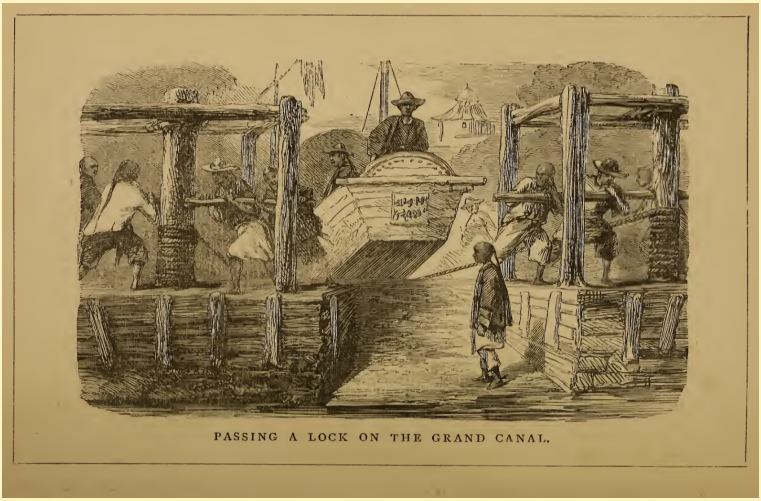
正当杨格非筹划在平湖一带进一步开展工作时，松江府（Sung-Kiang-fu）城的一位本地人主动提供一所房子，供他居住和讲道。因家庭缘故，离上海近些为好，他接受了这番好意，于1858年7月底离开平湖。松江府是江苏省（Kiang-Su）的府城，距上海约四十英里。当地人以学识渊

博、举止文雅自豪。几个月前，一位传教士曾试图在那里定居，却因官府干涉而被迫离开。杨格非大力开展工作约十天后，地保想吓走他。他看出，若不果断行动，大小衙役会接连不断地骚扰，于是决定直接致函知府，说明自己在城中的行踪、来意，并引述新订中英《天津条约》（Treaty of Tientsin）的若干条款。他请师爷（pundit）写了一封很客气的信，差仆人送去。官府没有正式回复，但太平了一阵子。过了一阵，小吏们又开始暗中滋扰，但传教士应付裕如。他告诉他们，自己已致函知府大人，此事现在是他与那位大老爷之间的事。这话果然灵验，一众宵小作鸟兽散。每天都有盛大的会众聆听救恩之道，三周内便有五人申请加入教会。

9月，第二个儿子出生，取名大卫（David），他不得不返回上海。教会由负责的布道员照料得很好。

1858年10月初，杨格非与三位同工决定作一次长途巡回，沿大运河（Grand Canal）各城讲道、分发书籍，一直走到运河汇入黄河之处。他们也想了解大沽炮台（Taku Forts）失守和《天津条约》（Treaty of Tientsin）签订对百姓有何影响，宣教工作究竟能推进到什么地步。

大运河长六百五十英里，分三段，分别开凿于三个朝代。运河与其连通的江河，构成一条几乎贯通帝国南北的水道，即从北京（Peking）到广州（Canton）。在黄河与扬子江（Yang-tsi）之间，运河沿人工土堤开凿，两侧砌着石墙，许多城市的安危系于这些石墙的稳固。运河沿线有几十处钞关，官员们的主要职责似乎就是盘查可疑人物。其中最厉害的是苏州以北十英里的浒墅关（Hiibz-Gwan），通常绕行；少数胆敢硬闯的旅客都被当即遣返。但这一次，横在运河上的拦河船一听说船上有四个西洋人，便转开让他们通过。但在镇子另一头，一名官员高声喝问："站住！什么船？船里是什么人？"有人告诉他，是从上海来的洋人。"是商人吗？有货物吗？"杨格非说："不是。我们是传道人，此行唯一的目的是讲道和分发书籍。"听到对方说自己的语言，官员的态度似乎缓和下来，也有了信任；记下他们的名字，又收下几本书，便放行了。



图二：大运河上的船闸

一行人接着来到常州府（Chang-chew fu），马可·波罗（Marco Polo）称之为"伟大而高贵的城市"，是总督驻地。这里运河上横着一条粗大的铁链，上海来的船突然出现，把钞关的人吓得惊慌失措。听说洋人还要渡过扬子江，他们更加不知所措。显然是要请示上司，他们被扣留了一夜。次晨获准前往下一城丹阳（Yan-yang），到达时两位武官前来，查问他们的来意。武官们仔细翻看了书籍，说："我们看出你们的目的是劝人弃恶从善。"接着长谈一番，中式逻辑与雄辩倾巢而出，劝他们回去。据说乡间动荡，盗匪出没，叛军活跃。但传教士们明确表示不回去。次日早晨，一位文职官员（literary Mandarin）带着大批随从前来拜会。他态度十分

和蔼，还答应派船护送他们到下一站。他走后，举行了英语礼拜，也向大批本地会众讲了道。收到官员送来的糕点菜肴，都是最高规格的中式做法；次晨传教士们回赠了医药及其他书籍。他又回赠了茶叶、糕点和枣子。一行人继续前行，一路受到礼遇。

老百姓不知该如何称呼传教士。杨格非听见一个妇人说："看！有个小洋鬼子。"被问的妇人说："是啊，是个真洋鬼子。"——"鬼子"指的是洋人，不是叛军；后者像欧洲人一样蓄发，不像中国人那样剃发。

回程他们走了另一条路，走访了许多传教士从未踏足的城市。他们还在杭州（人间天堂）住了四天。他们在那里自由讲道——不久前，一位冒险到此的传教士还被传到官府，押送回上海。



图三：中国人的面孔类型

1859年6月，杨格非与慕维廉牧师（Rev. W. Muirhead）前往黄河一带，若可行，计划再往淮安府（Hwai-ngan-fu）以北走几天的路程。这趟行程有几件不寻常的事，值得一记。

6月8日清晨，他们抵达江阴（Kiang-yin）城，正值府试，三千士子云集。杨格非对一群士子讲了一阵，其中一人涨红了脸，摆出威胁的架势。杨格非不予理会，讲完便安静地走开。听见身后喧哗，回头见几个士子正煽动百姓。他试图安抚，他们却越发暴怒，为首的攥紧拳头，作势要打传教士。凭经验他知道，露怯与冒进同样危险，便不紧不慢地往前走。他们又喊他不是洋人，是乔装的长毛（long-haired rebel）。他郑重声明自己是英国人，并带着可以原谅的自豪

注意到，这话让其中几个人变了脸色。那一刻在中国，"我是英国人！"这句话的道义力量，绝不亚于拉丁语"Ergo Romanus sum"（我是罗马人）。杨格非明智地把事情经过禀报了官府，官员说已严令所有差役必须善待洋人。下午，传教士们向大批专心的听众讲道。

次日他们渡过扬子江，江面宽五英里。一上岸，传教士们便登岸步行前往清江（Tsing-kiang）城。他们踏入了全新的宣教禾场。杨格非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情感，能比得上传教士头一次向被罪捆绑的百姓指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1:29）时心中的喜乐战栗。"许多城镇全城出动，围观来客的相貌和奇装异服。杨格非担心这份热闹会妨碍百姓听懂道理，但盼望下一位传道人来时"道路已经预备好了"。在江阴（Kiang-yein），传教士们有数千听众，人群中有许多富有且显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在这里，杨格非与一位中国售书员长谈，他是丹徒（Tan-tu）人。他是个安静体面的居士，怜悯人的愚昧罪恶，专心分发佛、道、儒三家的书籍。许多富人学者支持他；杨格非认为，三教的拥护者正是以这种方式联合起来，积极传教，以对抗基督教。

抵达清江浦（Tsing-Kiang-fu）时，数千最喧闹的百姓围拢过来。传教士们向官府递了名帖，不久一位蓝顶武官（military blue-button rank）来访，十分健谈，请他们到"寒舍"喝茶。他们表示离开船只怕不安全，他说"不必在意"，随即命人给每人备了轿子。官员起身告辞时说："你们还是别来了。"他们猜想，官员本指望他们客气推辞，没想到他们当了真，不禁扫兴。

官员走后，各衙门派来一群白顶官员（white-button rank），问的都是同样的问题，目的是互相对口供。几个人奉命留在船上，美其名曰保护船只，实则监视传教士的一举一动。岸上还派了两名士兵维持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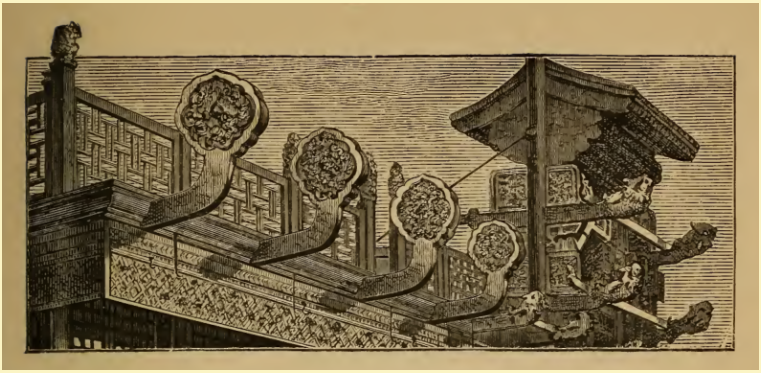
传教士们想去看黄河故道，请求备轿，一位"护卫"答应去办，但须先禀报上司。轿子很快来了，正要出发，一位官府朋友请传教士们稍等，说要再给河台（Ho-tai）送个信。轿子忽然全没了影，再也没回来。传教士们的耐心被消磨了六个小时，决定采取果断行动。最后一次申请时，被告知天色已晚，不如等到明天。对这种两面三刀十分气愤，传教士们说不等了，走路去，随即跳上岸，轻松穿过人群。这一招出其不意，打了官员们一个措手不及。两名白顶官员和两个壮汉跟在后面，挡开人群，倒也派上了用场。

杨格非写道："我们很快到了黄河故道，发现正如中国人所说，干得像尘土一样！我们不仅干着脚走过去，还把它当成了临时的讲坛。几年前黄河（Hwang）还在这里浩荡奔流，令平原百姓望而生畏；如今茅屋星布、园圃成畦、羊群吃草、车马往来。此处河床几乎与两岸齐平，表层是极细的沙土。这里有几处水洼，但没有水流。"

"这巨变的原因，只好留给地质学家去精确解释了。在外行人看来，老黄河似乎是用自己挟带的泥沙淤塞了河道；如今它虽经沧州（Tsan-chew）一带流入渤海湾（Gulf of Pechele），但用不了多久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淤塞新河道，被迫折返故道，或另寻第三条出路。"

这个预言尚未应验；不过1887年秋，老黄河在上游更远处决堤，淹没大片土地、夺去许多生命财产，算是它将来可能作为的一点预演。

传教士们回到船上，从老师（teacher）口中得知，他们不在时，官员们议论的话题正是洋人的直率、无畏和机变。他们本想继续前行，但没有护照，官府又布下严密的监视网，禁止任何人与他们交谈或提供消息，只好决定折返，一路平安无事。他们注意到当地的交通工具是马、骡、驴、独轮车和骡车，只见过一峰骆驼。



第三章　太平天国之乱

"你们要听真理，听了就要遵行；
你们要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不要爱黑夜，要爱光明的日子，
那是生命与自由。
使人自由的那一位使你们自由，他折断杖；
他吩咐你们向天向日抬起头来，
作永生上帝的自由人，
单单跪拜他。"
——波拿博士（Dr. Bonar）

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在中国国家漫长的历史中，无数次的叛乱与改朝换代，既中断了它的生命，也延续

了它的生命。对中国人来说，革命的意义甚至超过了对现代巴黎人的意义——革命是他摆脱暴政的唯一合乎体制的手段，在他心目中，革命与爱国的英勇事迹、高尚的自我牺牲，以及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联系在一起。

历代王朝的建立者，通常都是品德高尚、性格刚毅之人。后代子孙逐渐堕落，直到出现一位兼具荒淫与残暴的皇帝，治国只作恶事。于是国破，随之便有爱国者崛起，如灭掉著名夏朝的汤所言："我敬畏上帝，不敢不诛此暴君。"

大清满洲王朝虽有鞑靼出身的不利条件，却以宽仁之政治国二百年。1830至1840年间，叛乱、水灾、饥荒异常频仍，民怨沸腾。此外，外人势力日增，麻烦亦随之而来。

当洪秀全（Hung-sew-tsuen）——太平军首领——崛起时，全国正动荡不安。他是个穷孩子，出身受歧视的客家人，客家人至少在感情上，一向是"反对"政府的。他头脑聪颖，思维方式本质上是中国式的。不知何故，他在广州几次科举都名落孙山。他野心勃勃，只好走非正统的路子求名。1837年，他大病一场，恍惚中见异象，自称为天上的王子，并在门柱上张贴告示："天王、全王秀全的崇高原则。"须知，这份告示发表于他接触基督教之前；此后，他对自己在世上至高统治权的主张，从未减损分毫。1843年，他开始研读基

督教小册子；1847年，师从广州的美国传教士罗伯茨先生（Mr. J. Roberts，即罗孝全）。他的所作所为使我们断定，他并非真正公正无私的求道者，而是在寻求比中国经典所教更强大、更新颖的原则，以增强并塑造他神圣使命的主张。他的著作表明，他并未领会基督教的真正精神，但他把其中一些教义化为己用的技巧，实在令人惊叹。这些成就，非寻常狡猾的骗子所能及，足以证明他是真诚的，他的天才得益于对自己的深信不疑。

就是这个人，要席卷这片广袤的土地，在十六个省、六百座城造成浩劫。

1851年，洪秀全开始进军，1853年定都南京——帝国古都，他占据此城直到1864年6月自杀。他把自己完全幽闭在一座大宫殿的围墙之内，不许任何男性侍从进入外朝以内。在内廷，天王由众多妻妾侍奉。他有时举行朝见，大臣们获准接近御座，但只有他的兄弟们，以及洪仁玕——干王（Kan Wang，盾王），他的族弟兼宰相——能自由觐见。

此人在诸王中，某些方面最为卓越。他曾受理雅各博士（Dr. Legge）栽培，在香港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担任助手。他后来声称，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学会了相当的英语，熟悉了欧洲风俗，历时两年设法

前往南京。几经周折、屡次死里逃生，他于1859年投奔族兄天王，不久被封为"干王"，即盾王。

洪秀全相信——他的追随者也同样宣称——他与众不同，是上帝的幼子、耶稣基督的弟弟，与基督同等，受差遣向人类颁布新的启示。

驻上海（Shanghai）的传教士们，自然渴望亲身观察太平军中的确切情形，以及他们的宗教观点和生活方式。五人一行，包括杨格非先生，访问了苏州，一路上却也经历了些新奇遭遇。杨格非先生说，十二个月的事件仿佛浓缩在了一周之内。第二天夜里，他们险些遭到愤怒而多疑的村民袭击。第二天得知，当时锣声一度就要敲响，召集全村人动手。传教士们解释清楚后，人群才散去。第三天夜里，船只停泊在村民与起义军的交火之间。第四天夜里——最难熬的一夜——他们在运河中漂浮的死尸之间度过。船只不得不在高度腐烂的尸堆中，挤开二三百码的路。死者中许多被起义军所杀，但更多是自杀。

抵达苏州后，传教士们受到忠王（Chung Wang）李秀成（Li-sen-cheng）的热情接待。此人被迫加入叛军，从普通一兵做起，已升为大将。洪仁玕被封为干王（盾王）后，天王（Heavenly Monarch）觉得有必要把他手下最能干的

两员大将也封为王。于是李秀成称忠王，陈玉成（Chin-Y-ching）为英王（Ying Wang，英勇之王）。后者又称"四眼狗"（Sz'-yan Kow）。

忠王除了战功卓著，为人亦称正直，反对部下的暴行，保护受难的百姓。

访客们等了一个半小时，因为英王正在拜访他的兄弟首领。随后，在爆竹、音乐、锣鼓声中，他们被引至大厅，百名官员仆役，身穿红黄绸缎袍帽，分列两旁。他们表示不愿向这位大人物下跪，获准鞠躬，并在他面前站立片刻。随后被引至王的右侧，在觐见期间一直站在那里。

传教士们向王说明来意，王提及几条基督教主要教义，得知西方各国也信奉这些，很是满意。他问他们还有没有别的事要提，他们说有些同胞从事贸易，若他部下所占各省的丝绸贸易不受阻碍，就很好了。他答道天王也希望如此，会照章征税。他欣然接受了圣经和书籍的赠礼，并邀请一行人多住几日。随后他们行了与进门时相同的礼退出，被人用马送到高级官员连大人（Lien）府上，连大人盛情款待了他们一晚，应他们要求，又把他们送回船上。

他们注意到，太平军所到之处偶像尽毁；八字桥（Pa-ch-ih）庙宇墙上有告示，劝百姓抛弃恶俗迷信，敬拜天父，

并向新朝统治者纳贡。若照此行事，可得优待，否则必受惩罚。

叛军首领们通晓许多基督教真理，一向称传教士为"我们的外国弟兄"，说："我们敬拜同一位天父，信奉同一位长兄（耶稣基督），何必不和呢？"士兵们却不是什么有出息的人。

当时太平军意气风发，说照时局看，两年足可完成推翻清廷的任务。

传教士们回到上海不久，艾约瑟先生（Mr. Edkins）和杨格非先生各收到一封信，一封来自忠王，一封来自干王洪仁玕，邀他们去苏州见干王。他们觉得非去不可，也十分牵挂此人，想鼓励他把真理传给叛军的可嘉努力，并向他提些建议供参考。

他们惊讶地发现，清军最远的军事据点距上海仅十英里，过了那里，一直到苏州，路上竟一个人也遇不到。他们经过一座清军所造、弃给起义军的浮桥。墙上贴着告示，劝百姓安居乐业，备礼物来做顺民。

一位乡民说："皇帝是谁，是咸丰（Hien-fung，当今在位者）还是洪秀全，都没什么要紧，只要让我们照常过太平日子就行。"这是普遍的心声。

乡间残破荒凉。昔日繁华城市、商业市镇所在，如今只剩废墟。大多数地方是被清军烧的。起义军也有些暴行，但百姓说那都是新兵干的，受过较好教导的老太平军待人仁厚。

传教士们于1860年8月2日抵达苏州，当天即与干王会面。他多方打听他在上海差会的老朋友们，听说各地有人归主、西方有复兴，很是欢喜。他说："基督的国必扩展，胜过一切反对；天朝结局如何且不论，这事毫无疑问。"随后他脱下朝服，屏退侍从，与他们密谈。传教士们接受了他共进晚餐的邀请，开饭前，应干王提议，大家唱了一首赞美诗并祷告。他选了麦都思博士（Dr. Medhurst）的一首赞美诗，亲自起调，音准而热忱。谈话全是宗教话题，他似乎不愿谈别的。

他说，他去南京的目的是传福音，但向族兄太平天王请示时，天王不听，执意提拔洪仁玕。他虽忠于叛军事业，却屡次说，在香港当助理传教士时，比当太平军的盾王更幸福。

第二天，传教士们去看洪仁玕，见他十分激动。他致外国列强代表的信件被退回，一位送信的外国商人告诉他，上海已被英法联军占领。前者他视为侮辱，后者视为破坏中

立。传教士们说除了同情，别无他法能做，与他长谈之后，大家唱诗，干王热切祷告，愿纯正的基督教早日成为中国的宗教。这一幕永生难忘。之后传教士们收了些礼物，回家去了。

他们对此行十分满意，欣喜地看到干王是敬虔的上帝敬拜者，常读圣经和其他基督教书籍。

此时松江城被叛军重夺，杨格非先生创办并照管的兴旺教会，再度星散。

即便在上海，也几乎做不了什么直接的布道工作，因为人心惶惶。但这种动荡倒使传教士们得以照管南京的难民，艾约瑟先生和杨格非先生特别教导的有150至200人。当时传教士们恳切求告，愿这动乱归于秩序，也就不难理解了。

杨格非先生从苏州回来几天后的8月8日，起义军进攻上海。他们在城外不远处与清军激战，大败清军。随后直抵城门，若非英法联军的实心弹和霰弹迎头痛击，取城易如反掌。他们试图与城墙上的外国军官交涉，徒劳无功。星期一早晨，人们见他们向跑马场方向行进，立刻被击退。

很明显，起义军无意伤害外国人或其财产。传教士们后来听说，起义军对所受的接待大感惊讶，尤其因为他们事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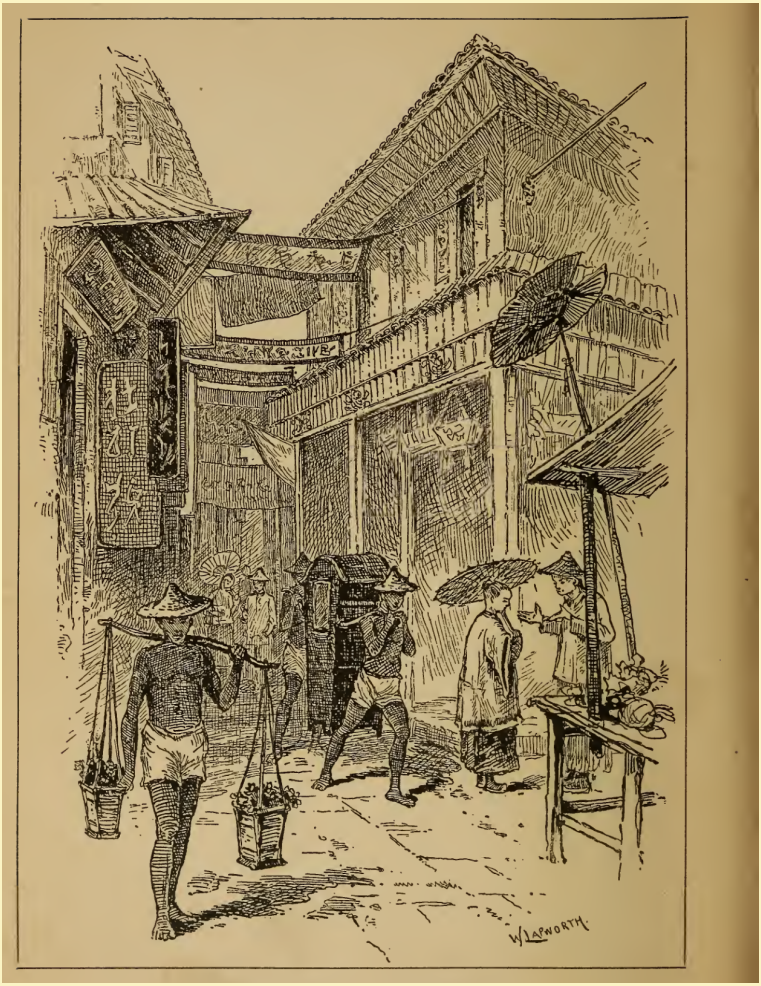
未接到任何官方通知，说联军要守城抗拒。受挫后，他们很快消失了。

虽在上海受挫，叛军在别处却十分活跃，山西省又爆发了另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

1860年秋天，情形就这样持续着，杨格非先生决心大胆前往太平天国政府所在地南京，向天王求一道宗教宽容的上谕。同行的是英国浸信会差会的克洛克斯先生（Mr. Kloekers），以及两位会说广州话的本地弟兄。到南京约250英里，所经城镇都以显著的敬意接待他们，待之如弟兄。此行大获成功，求得的上谕准许所有传教士，无论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在起义军辖区内居住布道。上谕有些地方文辞华丽，在所难免，因为是天王十二岁的长子执笔的。他父亲请他写，是盼他关心福音的传播。以下摘录可得其大意：

"我听说外国教师杨格非（Griffith John）及其朋友，慕天国之道，敬信我的父（上帝）和我的养父（基督）……特来请求准许广传真道。但念目下正值战时，兵士散布四方，恐传教士随从乌合之众，或有损伤，以致酿成严重后果。但我深知这些（传教士）是诚实忠信之人，以与基督同受苦为不足道，因此我十分敬重他们。

"着诸王晓谕大小官员人等，对这些人务必和睦相待，切不可滋生争端；并要优待这些（传教士）。钦此。"



图四：上海街景

太平军虽陷入许多严重的谬误，但基督教的种子无疑已种在首领们和早年入伙者的心里。他们做了一件好事：造成了一个真空——不仅捣毁了庙宇中的偶像，也在百姓心里造成了真空。传教士的工作，就是填补这个空虚。论到这道上谕，杨格非先生说："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无知，而是清楚地知道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差别。"

当时在南京的大将忠王，请杨格非先生代他转告外国弟兄，表明他的看法如下："你们得福音已一千八百多年，我们才不过八天。你们的知识应当正确广博，我们的必然有限不全。你们暂且包容我们，我们会逐步改进。福音只有一个，必须传遍天下。请外国弟兄们都知道，我们决心铲除偶像，栽种基督教取而代之。"

杨格非先生也写信证实了这一决心："从苏州到南京，一路偶像尽毁。"他还告诉伦敦会总部："叛军比清军领先了几个世纪。"

杨格非先生本打算离开上海去南京居住，但与年长弟兄们深思熟虑后，觉得当时还为时过早，因为两地交通几乎断绝，他将依赖叛军供养。这种依赖，恐怕会削弱他的影响力，损害差会。另一支英国远征队也即将溯扬子江而上，他提到汉口（Hankow）和九江可能开放。他初次提到汉口时

说："本会务必占领此地。中国再没有比这更重要、更吸引人的布道工场了。"这一预言已充分应验。多年后，伦敦会前任海外干事穆伦斯牧师（Rev. Dr. Mullens）——以其多国差会的阅历经验，堪称内行的评判者——访问汉口后说："这是全世界最好的差会站点。"

当务之急是决定如何度过冬天。1859年秋到的一批年轻弟兄，能协助年长传教士做上海一带有限的工作，杨格非先生遂决定去山东省的芝罘，与艾约瑟牧师（Rev. Joseph Edkins）会合。他一向办事果断，很快安排妥当，于1860年12月底抵达芝罘。

英中之间的新条约向直接布道开放了北方各省。杨格非先生到芝罘后不久写道："我们心里为这突然奇妙敞开的广大禾场满了喜乐，又为工人不足而几乎灰心。山东全省二千九百万灵魂，只有一个站点、两名传教士，算什么？直隶的二千八百万，扬子江两岸熙熙攘攘的众生，又算什么？简直什么都不算！教会若对元首不忠，对自己——世上光与生命之福的受托者——不诚，竟能袖手旁观吗？"

两位传教士并不气馁。有上帝站在他们一边，他们深信必成功；两人又都积极进取，不久走遍了芝罘附近几乎所有城镇乡村。

本省风景绝美。泰山是中国最高的山之一，山腰山麓布满宏伟庙宇，驰名中外。春天，朝山进香还愿的香客挤满道路。山东省又以孔子、孟子诞生地闻名。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葬于曲阜，陵墓庄严，掩映在橡树林中。

杨格非先生很喜欢这里的人，比南方人更英武。偶像崇拜在他们中间根子没那么深，许多人似乎更容易受宗教感动，对至高的灵界之主有明确观念。他们宗族观念强，这是显著的社会特征，也被认为有助于福音进展。许多村庄，五百至五千人不等，全由一两个家族组成；影响一人就是影响全村；一位族中要人归主，全族都会恭敬聆听真道。

1月4日，传教士们访问福山县，拜访县官，问他对他们租房有无异议。县官和气接待，说两国如今已是一家，他没有异议。于是租了房子，天天在那里讲道。

1月24日，传教士们骑马前往登州府和黄县，书籍行李随后由骡子驮运。他们发现这一带的人睡炕（nikang）——方形或长方形的土台，夜间有烟道穿过加热。火常常天亮前就灭了，炕反倒吸热。南国人因此避睡炕。传教士们运气好，找到了木床。

旅途饮食极其简陋，但听众听道的专心给了他们充分补偿。几位听众表明自己以前在上海听过道。

艾约瑟先生身体不适，行程缓慢。一到登州，就被领到一家舒适的客栈，各衙门官员都派差役来盘问他们的来历。

"尊姓大名？"

"贵国何处？"

"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身居何职？"

每个差役都问这一套。

杨格非先生把主日用在街头讲道散书上。除了专心听的，还有大群看热闹跟着的；不过也有人真心想知道这新道理究竟是什么。

第二天他独自骑马去黄县，讲道散书一个半小时。书很抢手，但有些谨慎的不敢收，因为这是头一回在当地散书，他们拿不准收下是否合宜、安全。这个城市虽大，论等级、人口和风景都不如登州。

第二天他们离开登州——十五万人口，风景壮丽。他们遗憾不能在这布道要地多花时间，不久美国浸信会的哈特韦尔先生（Mr. Hartwel）在此定居，遗憾遂消。当时起义军在山东进展神速，已逼近省城三十英里。鞑靼亲王僧王（Sung

"Wang"）两败于敌。鞑靼官员的虚弱，于布道工作倒是好事，因为这些满洲权贵恨基督教，铁板一块地反对它。杨格非先生当时写下的话，很快证明是真言："鞑靼大军在北方的屡败和全军覆没，已彻底动摇了满洲的权势。它必倒塌。中国已无力量能扶持它。若外国列强不干涉，广西起义必胜。满洲人想扑灭这被他们愚蠢暴政点燃的火焰，无异想把天上的太阳吹灭。"

杨格非先生这段布道劳苦不久即告一段落，好让他进入那与他名字永恒相连的工场。

中国正处在一个极有趣、极激动人心的关头，他认出来了。他写信给差会说："伦敦会先辈们想见而未见、马礼逊、马儒翰、麦都思等人勤恳流泪劳苦祷告想得而未得的，我们如今看见了、得着了。新条约开放了整个清军辖区，我经干王之手求得的上谕开放了起义军辖区……中国的四万万人，难道要因上帝子民的世俗和死沉，继续留在黑暗死亡中吗？从这片土地发出的呼声，难道穿不透我们的大学、学院和教会，在许多为基督奉献的心中激起配得上这紧急庄严时刻的回应吗？"



第四章　汉口布道站的建立

回来吧，圣洁的爱，你被如此粗暴地放逐，

当邪恶、仇恨、恐惧与不义临到之时；

回来吧，欢欣的光，你消逝得如此迅速；

复苏吧，生命，被死亡熄灭了如此之久！

重新接好，重新系紧那被残酷折断的锁链，

它曾把这下界与那明亮的天堂相连；

在高处悬挂那永恒金色的标记，

宣告大地更新、世人蒙赦。

揭开那遮蔽了千古的幔子，

它把那上国与这下界隔开；

恢复那久被禁止的团契；

神啊，愿祢亲自来此居住。

——波拿博士（Dr. Bonar）

对在华传教工作最大的助益之一，是那纵横交错的江河运河之网，使这个庞大帝国的许多地方都易于抵达。其中最重要的是扬子江（Yang-tsi）。在中国，人们称它为"海洋之子"、"大江"、"中国之束带"等。每年有四五个月，最大的轮船可以上溯一千多英里；而汉口（Hankow）在上游七百八十英里处，远洋轮船一年四季都可抵达。杨格非先生（Mr. John）初次溯江而上时，江面呈现出一幅奇特的景象。从南京（Nanking）往上，江水漫过两岸；平日里江面不过一英里宽，那时却宽达十至十五英里。有些地方江水与天际相接，茫茫一片，宛如内陆海；有些地方只见树梢露出水面，屋顶上还攀附着人。有时还能看见土地五谷之神端坐在高高的土丘上——那是某位信徒从被水淹没的神龛里请出来的，他相信这位神明能拯救祝福别人，自己却无力自救。

1861年6月21日夜里十一点，杨格非先生和威尔逊先生（Mr. Wilson）抵达汉口。那是一个美丽的月夜。武昌（Wuchang）城墙上下、汉阳（Han Yang）山顶，处处挂

着数百盏灯笼。每夜都由一名苦力点亮，作用和美国内战时期的木头"贵格会大炮"（Quaker guns）一样：吓唬叛军——因为城墙和山上根本没有士兵防守。

杨格非先生早就听说过、读到过中国这个大商埠，心中多少次渴望一游。武昌、汉阳两城和汉口镇，恰好占据扬子江与其支流汉江（Han）交汇处形成的三个角。抵达后的第二天早晨，两位传教士登上汉阳山，极目远眺，景象壮丽。扬子江泛滥的程度超过往年许多，地势平坦的汉口完全被江水包围。十二年前也曾有一次大水，水位比1861年还高十二英尺。那一次，多数房屋半浸在水中，人们住在楼上，靠划船做买卖。这给居民带来严重损失，但与叛军造成的破坏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叛军四次进犯汉口。前三次，百姓未受骚扰，财产也得到尊重；但最后一次，百姓被官府逼着抵抗，后果惨不忍睹，整个地方化为一片焦土。然而此地生命力极强，杨格非先生觉得它仍是一派繁华商埠的景象：若得太平，一年之内便可恢复旧观。只是每当人们把今昔对比，总不免叹息嗟伤。汉口人口曾约一百五十万，店铺、货栈、庙宇以宏伟华美著称。十八省的人汇聚于此，交换大帝国各地的物产。人们告诉杨格非先生，沿汉江、扬子江两岸延伸的那条主街，往日长达十二英里。他说："中国人把汉口称为'帝国之中心'、'帝国之心脏'，真是名副其实。若得太平——

从传教的角度看，它在我眼前展现出壮丽辉煌的异象。从这里出发，传教士可以轻而易举地深入整个帝国。"



图五：中国灯笼店

杨格非先生一向雷厉风行，抵达第一天就开始讲道；从那时直到如今，汉口每天都有福音被传讲，传教士的人数不断增加。当地人非常活泼，远胜他以前见过的任何地方的人；他们不仅聚精会神地听讲，还热切而感激地阅读分发给他们的书籍。

杨格非先生和同伴很快考察了此地，看出尽管内战造成局势令人沮丧，这里却是建立传教中心的绝佳之地，无与伦比。从镇江（Chun-Kiang）到汉口一带，十年来一直是广阔的战场和军营。城池屡得屡失，江面几乎被封锁，贸易停顿，繁华的城市沦为一片凄凉。但传教工作占据了他们的全部心思；房子租定了，讲道继续进行。叛军曾宣扬过一些基督教的道理，"上帝"、"耶稣"的名号有些百姓也认得，有两三个人甚至提出异议，认为这与"妖怪"（当时人们对叛军的称呼，"Monsters"）的道理无异。

8月6日，杨格非先生乘土船前往上海（Shanghai），把家人接到汉口。顺流而下途中，突遇狂风暴雨，小船眼看就要倾覆。船员除了一人之外，全都吓得魂不附体，认定必死无疑，一个个抖得像秋风中的白杨叶。好在风暴很快过去。杨格非先生于9月12日带着家人平安返回，旋即以极大的干劲恢复工作。

因没有正式的礼拜堂，讲道每天在杨格非先生住宅的一间大厅里进行，持续数小时。他有两位本地助手协助。听众来来去去，由十八个不同省份、因公来到汉口的人组成，此外还有本地居民。许多人迫切地打听耶稣的道理，所提的问题表明，他们比杨格非先生以往遇见的任何人都好问得多。几个人又来索取书籍和圣经单卷；有一个人让杨格非先生大为惊讶：他所学到的知识，以及他谈论父神、耶稣之死所成的赎罪、使徒保罗等题目时的准确流利，都令人刮目相看。

杨格非先生一向以怀柔的方式对待在位者，他把一本新约圣经和几部科学著作赠给道台（Tau-tai，汉口城的地方官）。大人不久便回访杨格非先生，令人惊讶的是，他对新约圣经表现出的兴趣，远胜过对其他书籍。

1861年8月，中国皇帝咸丰（Hien-fung）驾崩。他长期被一班守旧官员把持，那些人不愿与外国人往来，一心要把所有外国人扫出中华。这位驾崩的君主年仅二十六岁，却任凭一班不肖宠臣引他沉溺声色。宠臣中为首的是贪婪残暴的肃顺（Su-Shun）；他与怡亲王、郑亲王（princes of I and Ching）等极端排外派组成摄政会议（council of Regency），辅佐年仅八岁的新皇帝。



图六：肃顺，中国的摄政王

然而这些官员不得人心，种种作为早已让他们在百姓眼中威信扫地。因此，当已故皇帝的弟弟恭亲王（Prince Kung）于1861年11月3日发动政变时，不仅皇太后（Empress-mother）站在他一边，政府的文武百官和百姓也都支持他。摄政会议的成员被逮捕，软禁在各自府中；财产被没收，大权落入恭亲王和皇太后手中。

摄政王肃顺（SU-SHUN, REGENT OF CHINA.）

按中国人的观念，肃顺应对先帝朝的弊政负责。于是在灵柩送入北京（Peking）宫中时，他被解除兵权、撤去侍卫，单独看管。政变之后，他被褫夺一切官职，降为普通士兵，穿着一件普通的羊皮袄，用一辆大车拉到北京菜市口（Cabbage Market）。唯一的欧洲目击者洛克哈特医生（Dr. Lockart）记述说：他下车时神情凶狠暴怒；稍一停顿，一群高官围了上来，片刻之间他被迫跪下。官员们向他鞠躬，刽子手手起刀落，砍下了他的头。

这次政变对中国帝国影响深远。对外政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恭亲王精明地看出，中国既无法成功抵御列强，又要图强，除了改弦更张，别无他路。

政府更迭的影响很快遍及全国；再加上中国败于西方列强之手，又有太平军（Taipings）等叛乱作祟，国民的骄气

被打了下去，百姓变得更加温顺，也更易接受外来的影响。外国人住在汉口，让百姓多了一份安全感，这也有助于培养他们对传教士的好感。官吏们对杨格非先生十分友好。知县两度来访，还写了几封亲切的信；布政使（Lieutenant Governor）则送来一道告示，让他贴在门口，严令兵民不得伤害骚扰外国人，违者严惩。杨格非先生趁此良机，得以在汉口最高层的社交圈中宣讲基督。一位官员朋友请他吃早饭，还邀了几位客人作陪，其中有一位湖南（Hu-nan）的武官。这位武官夸耀湖南人的荣耀和勇武，说他们绝无信耶稣的可能，耶稣的道理也绝无在湖南扎根之日。

"且慢，我的朋友，"杨格非先生说，"湖南人还不认识祂的位格和品格，所以眼下不能信祂；但不久他们会更认识祂，谁知道将来会有多少人归向祂呢。"

"绝无可能，"那武官说，"我们有孔子（Confucius），耶稣不能和他比。"

"祂远比孔子高：一个属地，一个属天。我们西方圣贤多的是，但我们从不拿他们和基督相提并论。"

"可是，"武官说，"圣人都是天（上帝）所差来的。"

杨格非先生回答："基督不仅是神所差来的，更是神道成肉身——神在肉身显现。"

这道理冒犯了武官的骄傲——古今中外，人人的骄傲都被这道理冒犯。但这次谈话又引出更多交谈，让传教士大得安慰。

1862年初，杨格非先生报告说，在神的祝福下，靠着谨慎不懈的劳苦，工作稳步进展。在此之前，他在汉口一直是孤身一人。新年过后不久，两位本地助手来与他会合，都是南京人。出现了几位诚恳的慕道者，但他们多是汉口庞大流动人口中的一员，不久就离开了。每天下午，大厅里挤满了人，杨格非先生和两位本地助手讲道四五个小时。他常向听众提问，好几次被他们知识的广博准确所折服。

一天，他问听众：上帝是谁?

一人大胆爽快地回答："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上帝是灵吗？"

"是。"

"有几位上帝？"

"一位。"

"可是中国人拜许多神，你怎么说？"

"都是假的，是人凭空想象出来的，或是死人被追封为神的！"

"被神化的人真是神吗？"

"当然不是；有名无实罢了。"

"那'玉皇'（Yu-'hwang）呢？举国上下都那么尊崇他，你怎么说？"

"他也是人造的神，不是真神。"

"耶稣基督是谁？"

"是上帝的儿子。"

"祂是上帝吗？"

"是。"

"祂为什么到世上来？"

"祂来拯救世人。"

"祂怎样拯救世人？"

"祂舍命救赎他们。"

"你从哪里来？"

"从黄州（Hwang-Chew）来。"（离汉口约五十英里的一座城。）

"你在哪里听到这些道理的？"

"在这里。"

"你听过几次福音？"

"去年听过两三次，还带了几本书回家。今天特地又来听你讲道，还想多求几本书。"

这只是众多听众中的一个例子，也显出新教的教导方式比天主教高明。天主教在中国已有五百多年历史：外国神父不讲道，除了本地代理人带来的慕道者，不与任何人接触；就连本地代理人也不公开讲道，只在相熟的人中间悄悄活动，偶尔给归信者发些书。

新教的方法，是向所有愿意听的人大声宣讲，把书籍单张尽量广散。其好处显而易见：天主教神父可能在一个地方住上几年，除了归信者没几个人知道他的存在；而新教传教士一到，就有成千上万的人知道他是传新道理的先生。每天有数百人听讲，很快就掌握了主要的道理。这些道理成了家庭、茶馆和其他公共场合谈论辩论的话题。谈论、发问、怀疑，都是人心转变必经的步骤。新教教导的另一个好处是：传教士虽定居一城，却能借着来往的商旅，把影响带到远方的城市和省份。1862年3月，一位老人来听杨格非先生讲道；杨格非先生问他以前听过福音没有，老人说多年前在上海听麦都思博士（Dr. Medhurst）和慕维廉先生（Mr. Muirhead）讲过。老人对拜偶像的愚妄似乎已深信不疑。

当时，许多听过福音的人想出于世俗动机加入教会。其中有个机灵的乡下男孩，拿着一封信来见杨格非先生。信上说，这孩子想学习基督教道理，以便加入教会。杨格非先生劝他每天来听讲。几天后他又拿来一张字条；本地助手一问才知道，乡下人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凡信教的人，每天能领到一点米；这孩子是被派来试一试的，若试成了，后面还有人跟着来。他一明白真相，立刻就不见了。杨格非先生常常在恳切讲解福音之后，被某个中国人木然一问浇一盆冷水："信耶稣有什么好处？能给我们米吃吗？一个人进教会能领几个铜钱？"中国人就是这样！

当时杨格非先生写道："我们在中国很少看到真正的归信——真正转向神的人。这是一块硬土。劳苦撒下去，收成却很少。有时我非常灰心，几乎要倒下。撒但有时用最地狱式的逻辑来跟我说话；但感谢神，祂赐我们得胜，我至今靠祂站立住了，将来也必靠祂的帮助坚持到底。请为我祷告。"

写下这段话整整一个月后——1862年3月16日，主日，汉口新教差会的第一位归信者受洗；6月8日，又有七人——四男二女——相继受洗。其中信仰感情最深的一位，原是观音教（Kwan-yin）的虔诚信徒。他似乎一直感到属灵的饥渴；

尽管他所属的教派立意不算不高，其规条却未能更新他的道德；直到福音的光照进他的心，他才找到满足饥渴的东西。

劳苦十二个月，汉口的幼小教会已有十二名成员。加入教会后，他们受到细心的管教和训练，学习自治。杨格非先生编了一本小小的赞美诗集，文字浅显，人人能懂，又不至于太冒犯文人雅士的口味。他还编了一本小册子，专门回答听众常提的问题。

1863年8月12日，杨格非先生痛失同工——威尔逊牧师（Rev. E. Wilson）患痢疾，病了几天便去世。他为人坚忍、谦卑，判断稳妥。杨格非先生深感悲痛：威尔逊先生人品高尚，本可成为出色的汉学家和得力的传教士。他四年的传教生涯，刚够同工们认识他的价值、展望他大有可为的前程；他们看到的，却是他在世生命光明喜乐的终结。

杨格非先生请临终的同工留下祝福。

威尔逊先生回答："我的祝福不值什么；不过，愿神祝福你——祝福你的灵魂、你的健康、你的家庭，你家中的每一位成员。也愿祂祝福你的工作，祝福本地教会；哦，愿你得着许多许多的灵魂，作你在那日的喜乐冠冕！"领受这祝福的人，已从圣灵得着许多凭据，证实这祝福确已应验在他身上。

抵达汉口后不久，杨格非先生的目光就投向邻近的武昌，认为那是开展传教工作的理想之地。武昌是湖北（Hu-peh）省会，也是湖北、湖南两省总督（Viceroy of Hu-peh and Hu-nan）驻节之地。它位于扬子江右岸，与对岸的汉阳府城（departmental city of Han-yang）隔江相望，离汉口很近；城墙周长约十英里，人口约四十万。武昌不仅地势优美，更是全国政治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杨格非先生看出，这里是打开两省的钥匙：如果武昌能向新教传教士开放，两省也就敞开了。

从没有哪位谋士定过更大胆的计划，也没有人如此坚定不移地执行；从没有人把人的品格与制度研究得更透彻，也没有哪位外交家用词行事比他更精明老到。汉口的一位本地布道员被派到对岸去租房子；房东们虽愿意出租，却不敢在未经官府许可的情况下把房子租给他。

既然必须经过官府，杨格非先生决定直捣源头，省却许多周折——直接去拜访总督。他先送上宗教和科学书籍，开路铺垫。关总督（Kwan）知道杨格非先生的身份，为人也一向慷慨大度，对外国人友好。在偏厅等了两个小时，杨格非先生才得蒙接见；总督大人亲自出来迎接，坚持请他坐上座，自己坐在下首。

总督谢过书籍之后，问了几个关于新约圣经作者和含义的问题，又请教传教士对中国三教的看法，并问基督教与三教有何不同。杨格非先生欣然抓住这个机会。当然，总督大人太讲礼数，不会反驳，甚至不会露出半点不以为然的样子——那将大失礼数。他大概一个字也不信传教士的话，表面上却听得津津有味。对于杨格非先生进入武昌的提议，他以传教士的安危为由，提出一两点小小的异议。百姓愚昧无知，他虽然很乐意

……若有洋教士住在那里，与他们相交甚笃，他也不忍心看他们受辱遭险。

杨格非答道："宣教士若有必要，受些苦楚原是预备好的；但总督既驻节此城，威令行于全城，这样的必要本不该发生。"

"好吧，"大人接着道，"若这些顾虑在你看来不算要紧，你便有我的允准。两国如今已为一体，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

"好，甚好，"杨格非答道，"大人胸怀磊落，义正言宏。既两国一体、无事不可为，或可出示晓谕，告知百姓可将房

屋出租；若大人以为不便，赐我一纸私函，出示相关人等，亦无不可。"

总督神色和蔼，说这两样都不必。他自会知会县令，嘱其尽力襄助，保此事成功。

谈罢，略用了些汤饼，杨格非便告辞而去。

他深知这口头应许眼下并无大用；但有了它，日后他若进了城，地方官要驱逐他便难以开口了，这倒值得高兴。

为试探大人的应许是否算数，他派了一位本地传道员过江再试。不料官府早已先下手为强。传道员所到之处，主人开口先问："有房可租，只是不知租给谁用？可是租给洋人？"即便告诉他们，洋牧师已谒见总督，得了允准，也毫无用处。"空口应承，我们可不信。那一套哄洋人去吧。牧师若能拿到晓谕贴上墙，我们便认。"

关总督见过杨格非之后，第一件事，无疑是密令城中百姓：武昌城内，地亩一概不得租售与洋人。

杨格非继而去拜访县令。县令正忙于武举考试，杨格非便修书一封，告知自己已谒见总督，得允在城内居住，总督亦应许知会县令、嘱其相助。百姓无县令之令不敢租售地亩，还望县令晓谕百姓，杨格非感激不尽。

（图：衙门——官署内景）

杨格非　68

回信到时，只见词句华美、礼数周到，却荒谬绝伦——非中国官员写不出这样的信。信中承认杨格非在城内居住之权，凡力所能及无不愿为。大人既说了"可"，他不敢说"不可"；但自古以来，官府从不干涉百姓私产，此事他实在无能为力。信中建议杨格非自行深入民间买卖租约；若得成事，需要时他的交情与相助自可指望。

这封信将来或有用，眼下却比废纸不如。

杨格非让数星期过去，心意却愈发坚定。一八六三年十二月前后，他觉得该重整旗鼓了。以自己名义买卖租约已告失败；而且除通商口岸外，洋人能否依法置产，本就成疑。他灵机一动：何不嘱首席传道员以自己的名义、为本地教会买地？若信教自由的条款还有半分意义，他作为基督徒自有此权。计议已定，便向传道员说明，对方即刻应承。教会一位执事是武昌本地人，也应允相助。杨格非嘱咐他们严守实话：若有人问起，绝不可否认地是要用来建礼拜堂。

数日之内，地便买下了。契据随即送往官署立案，取得官印，片刻未耽。

契据在手，杨格非可从容笑看官府将掀起的风暴。他在买地当日的日记中欣然写道：

"一八六四年一月二十日。今日已在武昌为本地教会购得一块地基。地处闹市主街，宽约六十英尺，长约一百六十英尺。待春节庆典过后，盼能在其上兴建适宜的房屋。困难仍在前头，但蒙上帝赐福，此举必成。"

原业主答应三月底前把地腾清交割。不料官府先已察觉。地主被传到知府衙门，被控把地卖给洋人的罪名。他矢口否认，说的全是实情：他根本不知此事与洋人有关。

知府道："卖给谁你不知道，买来做什么我却知道。你即刻去见杨格非的助手沈子星（Shen-tsi-sin），告诉他：这地若留作私用，便随他留着；若是为传教之用，劝他趁早收手，还顾惜性命的话。"此话传到已是四月一日。次日，杨格非写信给知府，大意如下：

"余系英人，乃耶稣圣教之宣教士。按《天津条约》，凡传扬教导基督教者，均应得官府之保护与优待；本地信奉或教导基督教之华人，亦享同等权利。且英吉利臣民，有权享有他国臣民所得之一切权利、特权与优待。今本地华人既有权信奉并传扬基督教，自有权购置必需之房屋以供其用；英

吉利臣民既有权享有他国臣民之一切特权，则余身为耶稣圣教之宣教士，自有权居于武昌——罗马天主教之神父亦居于此。此外，余初到之时曾谒见总督，禀明职任与工作性质，恳请允准在武昌开展工作。

"大人待余甚礼，当卫理公会宣教士考克斯牧师（Rev. J. Cox）及数位华官之面，公开允准，并言两国既为一体，无事不可为。大人何等人物，岂有轻举妄动、空言无实、出尔反尔之理。又，县令复余之函中，亦承认总督已允准，并请余自行往民间买卖租赁，保证力所能及必尽力相助。此函今在余手，随时可出示。

"余既有条约之权在武昌开展工作，又得两省最高长官之允准，又奉县令之劝自行租买，故请本堂首席助手前往购地。地旋购定付讫，契据亦经官府立案盖印。兹附旧契抄件一纸，足见此交易处处合法有效。余一切皆严守公义互惠之大义而行，昨日忽闻原业主不肯交地，谓官府宣称宣教士无权在武昌城居住传教。此事果真乎？莫非地主误会了大人之意？务请查明，饬令有关人等即速交地。"

杨格非　70

知府回信甚礼，允诺照办，数日内告知结果。

这封信却在官场掀起轩然大波，众官员被召至总督衙门商议。当务之急是："如何把这蛮夷挡在城外？"议论的大意是："说他无权在此，行不通——正如他所言，天主教的神父们就住在这里。怪他事先没跟我们打招呼，也没用——他确实见过大人，虽然那应许不过空话，我们却不能明说。何况县令那封信如今在他手里。还有契据，已正式立案盖印。还能怎么办？"

署理汉口道台主张不要干涉，让杨格非收地，因为在这样的案子里，抵抗毫无用处。此议被否决。另一人献计：可告知杨格非，此地系官产，私自出卖之人并无产权；因此契据须交还官府，价款退还杨格非，另觅他地。众人对此妙计大为倾倒，以为武昌或可免此"大难"。他们万没想到，这看似高明的念头，只会让他们败得更惨、更公开。这一次，谎言反噬了造谎者。他们若能花些时间，把这位精明的宣教士琢磨透——就像他琢磨透他们那样用心——该有多好。

不到三天，知府允诺的信到了杨格非手里，内容正是官府商定的那一套。

杨格非复信：此地必是卖主私产，旧契为证，确凿无疑。凭这般借口，契据断不能交还，务请即速过户。

此后，此事成了公众话题，士绅百姓纷纷上书官府，恳请不许宣教士在他们名城内建屋。二三百人一队，屡屡结队围堵官衙，哀求大老爷万不可放蛮夷携其邪说入城，毒害人心、败坏风俗。城墙上贴满告示，痛斥杨格非在武昌建屋之举，号召百姓竭力抵制，威胁凡相助之华人必遭报复，并发誓房屋一起便即拆毁。这些举动，多半是官府在背后煽动。

在这场喧嚣中，杨格非两三次拜访知府，双方书信往来数封。知府见要宣教士全盘放弃已无希望，便转而求妥协。他所提的方案，自以为中国人的机巧周旋能占上风：只要杨格非肯放弃此地，官府愿另为他觅一块地。

杨格非看出，官府一心想速了此事，只是碍于颜面——已宣布此地为官产、私卖非法，不便再交给他——便表示愿意以另一块同样便利、同样好、同样便宜的地来换。

官府以为这下拿住了宣教士，先想把他打发到某座山顶上去，不成，又想把他塞进偏僻后巷深处。试了几回，徒劳无功，这才拿出一块杨格非觉得可以接受的地。宣教士又胜一局，但这只是他成功的首付。

知府不得不亲自陪杨格非看地、督率丈量。这差事于他必是奇耻大辱，但上命难违，别无选择。

事毕，知府问："这块地，你看如何？"杨格非答："暂且将就用吧，虽不如先前那块中意。若肯按我的价钱给我，我便要了。"

知府答道："此事拖得我们都厌了，只求速结。银钱原是小事。你若说定要这块地、交还原地的契据，我们便心满意足，从此永结太平。你出什么价？"杨格非报了价，又说，若按原先付的那笔高价，他宁要先前那块。

杨格非　72

关于价钱书信往来两三天，地最终以略高于杨格非出价的价格卖给了他。这一次，契据由知府、知县亲自拟定，一八六四年七月十六日送到杨格非手中；他即刻把契据转到伦敦会名下，并以伦敦会名义在汉口英国领事馆立案。最辉煌的胜利还在后头：事定之后，官府随即出示晓谕，告知百姓此地已由杨格非购得，他按条约有权在彼建造房屋、开展传教工作。

人的忿怒终要成全他的荣美，人的诡诈终要服事他的旨意。他仆人的目标是进入武昌、开展工作，如今完全实现。一位与会官员转述的官府议事记录证明，争执的核心是进入之权，而不只是一块地。这场激烈持久的争斗，给布道所做了任何手段都做不到的宣传；官府编造的谎言反成了他们的

软肋，迫使他们不得不发出那纸最宝贵的晓谕，批准为"耶稣圣教"建造敬拜之所。武昌既是省会，此举等于向天下宣告了官府的折辱，邻近各城官民无不注目宣教士的胜利，也宣告了两省向有系统的宣教工作敞开大门。

与这班几乎不会说真话、不会行正事的官员缠斗近四个月，至此落幕。本地执事和传道员曾多少次心焦如焚，半夜里来找杨格非求安慰。

武昌传来的坏消息常把他们吓坏，杨格非费了好大力气才稳住他们的心。事后，官府、士绅一反常态，温文有礼。也当一提：英国领事在这段艰难岁月里尽力相助，杨格非对他的同情深表感激。

杨格非所建房屋包括：一座宽敞的礼拜堂、供外籍宣教士居住的两间屋、一所本地传道员的住宅、两间大学堂；半数地皮留作将来建医院或施药所之用。

地皮连房屋共费约五百英镑，几乎全由汉口的欧洲侨民捐集。杨格非只消开口，捐款便欣然汇集。

本地传道员鲍祥生（Pau-seang-sang）受托主持其事。他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商人，家境宽裕，已退出商界，把全部时间精力献给布道所的工作，贡献卓著。

汉口布道所的建立　73

应伦敦会董事会之请，穆伦斯牧师（Rev. Dr. Mullens）在离东赴任该会联席干事之前，到各华人布道所巡视。

他乘鄱阳号轮船（Po-yang）溯扬子江而上，太平军所造成的惨状令他痛心。他写道："江以南纵深数十里，尽被叛军蹂躏得惨不忍睹：城镇成打地被焚毁，百姓死于杀戮、瘟疫、饥荒者以百万计。抵达次晨，我们渡江到武昌。站在城中那座山顶，俯瞰脚下三座城垣与大江，我不禁觉得，无论在印度还是在中国，从未见过如此壮阔的宣教工场。武昌是省会，人口众多，不乏最有体面、最有影响的世家。汉口是通商大埠，是我所见最繁忙、最拥挤、最活跃、最富庶之地。大街闹市店铺林立，货品丰饶；小街巷弄也密密匝匝，人头攒动。

"布道所位于华界北端，地势甚佳，空气清爽。两所宣教士住宅连为一栋，建造坚固，皆有楼上房间，南面有宽敞回廊，底层架高三英尺以防潮。园子不大，沿南墙的一所男校刚刚落成。

"布道所的礼拜堂在城中心，主街之侧，建筑甚佳，正宜作集市礼拜堂之用，后面有传道员住宅和男校课室。我有幸听慕维廉先生和杨格非先生先后讲道；前者一登台开口，五

分钟内便聚满了听众。武昌城北门附近又有一座礼拜堂，建造亦佳，备有宣教士来访时住的房间、传道员住宅和学堂。我细看了杨格非为伦敦会在汉口所成就的一切，深感欣慰；其建筑的规划、式样、做工，以及选址，无不极佳。

杨格非　74

"诸位想必和我一样，早已认定这样的地势于宣教工作价值极高；但我郑重告诉诸位，实地所见远超我的期望。而我们的弟兄杨格非先生，更令我欣喜地看到，他与本会最高宗旨完全一致，处处维护本会利益，以卓越的判断与审慎，完成了托付给他的工作——他是汉口布道所的创立者。"

这位最内行的评论家，对布道所的物质面貌与影响百姓的机会，作出了如上评价。

此时汉口教会已有会员四十二人，另有慕道友数人；受洗者共四十六人，其中两人被开除，两人已存着信心离世；又在蔡甸（Tsai-tien）设立了一个兴旺的分堂，由卢向阳（Lo Hiang-Yung）照管，有会员八人。



第五章　本土助手——医院建立
——归信者剪影

树叶之于森林，
以光和空气为食，
趁它们甘甜柔嫩的汁液
尚未硬化成木——
儿童之于世界，正是如此；
透过他们，世界感受到
比树干之下所能及的
更明亮、更和暖的气候。
——朗费罗（Longfellow）

传教士生涯中最大的试炼，莫过于父母与儿女被迫分离。异教生活的环境对孩子道德的成长极其有害、极为不利，纵使父母倾尽全力呵护也难以抵挡。孩子们也必须送回国受教育。因此，1860年11月，杨格非（Griffith　John）夫妇把长子格里菲斯（Griffith），中文名梅福（Mei-foh），托付给几位朋友送往英国。虽然年纪这样小便要与父母分离，但每个夏季当地的气候都严重损害他的健康，不得不如此。与此同时，幼子大卫（David）病得很重，杨格非夫人身体也不好。然而经过三个月的忧虑煎熬，小家伙终于转危为安，入冬后恢复了不少元气。



图七：宣教士与归信者合影

1861年3月，第三个儿子出生，取名阿瑟·格威廉（Arthur　Gwilym），中文名却是天福（Tien-fuh），意为"天上的福乐"。

1863年9月，大卫患痢疾，病势沉重，父母数日之间都以为要把他交托给主了。然而这试炼中满了祝福：医药罔效之后他竟得以康复，这对杨格非是极大的安慰——他刚刚痛失同工，只得独自在"帝国的心脏"奋斗。四处华人布道站的工作和欧人侨民的事工都落到他一人肩上。此时已很明显，本该到期的回国述职假无法按时休了。即便立刻派一位年轻传教

士来接替，至少也要五年之后，杨格非才能离开汉口（Hankow）。

就在此时，杨格非夫人又为丈夫添了一个女儿，他欢喜地写道："我当然一直盼望有个女儿，这份礼物使我心中的钟声齐鸣。现在我心满意足了，我的家庭完整了。我想，没有女儿的父亲是不会幸福的。"

鉴于杨格非夫人身体持续虚弱，又恐小大卫在汉口再熬过一个炎夏会有危险，杨格非决定于1864年春送他们回国。那个冬天，他们得以住进新建的传教士住宅，大大受益。此前两年半，他们一直住在一所中式民房里，不仅狭小局促，而且有损健康。杨格非一如既往先想到的是工作，建造礼拜堂是他最关心的事。那座礼拜堂已启用一段时间。住宅落成后，他谈到建造工程时写道："我由衷欢喜这一切都已结束，我们也安顿得舒舒服服。礼拜堂稍小了些，能容纳约二百人。我每天约有150人的会众，聚会持续约三小时。我深信上帝必赐福给此地从异教中被召聚进祂教会里的这群人。我如今唯一渴望的，就是看见上帝的灵大大浇灌在这里的工作。请为此代祷。"

1864年，杨格非夫人带着孩子们回英国探亲，在故土住了一年，身体大为好转。与此同时，她忠心的丈夫正在汉口城外奋力推进工作。

他积极开展的乡村工作，亟需一位可靠的本土基督徒作助手。但在杨格非的归信者中那些"秀才"（Elegant Talents）里，没有一个比卢向阳（Lo Hiang-Yung）更合适的。他约四十二岁，受教育不多，但非常坚忍，能读书，写得一手好信。他多年修行苦行，因深感罪孽、惧怕将来的报应，曾弃绝尘世、离弃妻儿。汉口差会的开设对卢向阳真是大好消息。他极其渴慕一切属灵的益处，竟甘愿给杨格非当苦力——最低等的仆役，月薪仅十四先令。他读经、向人传讲极为殷勤，常常半夜还听见他在向上帝恳求。与家人重归于好之后，卢向阳被杨格非亲自栽培，训练作传道人。几经尝试、屡败屡起，他终于在蔡甸（Tsai-tien）开设了一处布道站——那是离汉口约二十英里的小地方。障碍虽多，但卢向阳的热心、朴实、诚实，加上杨格非及时的援手，都一一胜过，结了许多果子。

卢向阳却不满足于一处地方，得了杨格非的许可，便遍扫四乡，到处布道。一日，他腋下夹着五六尊神像来到汉口，呈给杨格非，并说几个月前他听说，在蔡甸再往前十英

里的小地方观音阁（Kwan-yin Kian），有几个人对基督教感兴趣。他立刻去探访，一位妇人抱着孩子出来迎他，孩子似乎奄奄一息。那可怜的妇人告诉卢向阳，她求医问神都徒然，心里十分悲伤。

卢向阳说："你们的偶像是假的，道士和尚只会欺骗你们。我敬拜的是至高的主宰（the Supreme Ruler）。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为你和你的孩子向真神祷告。我不知道孩子病愈是否是祂的旨意，但我知道，若祂喜悦，这事必能成就，也必因祷告而成全。"于是卢向阳"祷告了，深信上帝必应允"。

他下次再去，那妇人跑出来迎接，欢呼说孩子完全好了，基督徒的上帝才是真神。此后他常去探访；卢向阳请那些不再信偶像的人把偶像交给他，有两家人照做了。这些就是他呈给杨格非的"战利品"。从那时起，在观音阁，许多中国人在卢向阳忠心的劝勉下归信了。这就是罗教师——一个信心单纯的人，却在祷告和圣经知识上大有能力。

靠着天父智慧的护理，杨格非又得了一位刚强的基督徒相助，其才智胜过卢向阳，也颇有文学造诣。这就是沈子星（Shen Tsi-Sing），杨格非的主要助手和朋友。他1825年生于南京（Nanking），十五岁时被举为"文学硕士"（Master

of the Literary Essay），二十三岁考中人人艳羡的秀才（Sin-tsai）功名。他曾一度被迫为太平军效力，心中不乐，决意投江自尽。"站在江边，想到年迈守寡的母亲，他犹豫了。他回到住处，后来逃了出来；但他的妻子儿女，除一个女儿外，不久都在被迫的流亡生活中丧生。"在上海（Shanghai），他听见福音，起先轻蔑，继而疑惑；怀着这样的心态，他给几位传教士当起了官话教师。闲暇时他研读圣经，当时他这样形容自己："我的罪在我看来如汪洋大海；想靠自己的才干、德行或学问来赎罪，以求得天堂，就像想踩着一块小木板渡过险恶的大海，指望它把我载到彼岸的福地一样徒劳。"

沈子星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中成了杨格非的中文老师。他很快信主受洗；杨格非见他稳重勤奋，便安排他无论到哪里都随行，作为本土的朋友和助手。

杨格非在汉口安顿下来不久，沈子星便加入与他同工，忠心耿耿、坚韧不拔地作了二十五年基督徒传道人，深得杨格非满意。他过着堪为楷模的基督徒生活，直到1887年去世，对汉口教会一直有刚强而健康的影响。

沈子星成就的工作极为浩大。他每天上午在杨格非的书房里，撰写书籍、传单或书信（内容由杨格非提供），并阅

读或讲解重要的中外书籍；下午则在礼拜堂里，按当时的需要讲道、谈道或辩论。他在礼拜堂门口和汉口各处张贴告示，告知众人：每晚六至九点，他会在牧师室里与任何人谈论基督教的事。他也参与主日聚会，并巡访乡间各布道站，教导慕道者，坚固传道人们的手。他是优秀的讲道者，驳斥博学之士的异教论点大有能力；对杨格非而言，他实在是亲爱的朋友，也是最宝贵的帮手。这就是那群高贵的本土传教士中的两位主要人物——他们长久而干练地协助杨格非在汉口的差会工作。一位已经安息得赏，另一位仍留下来继续工作。

杨格非一面忙于督理差会事务，一面大力在汉口四乡巡回布道，深感家人不在身边的孤单，也渴望有一位欧洲同工的同情与帮助。1865年夏天的酷热更添他的孤寂之感；英国朋友们建议杨格非夫人把探亲再延长一年，他不赞成，也就不足为奇了。

11月，他顺江而下去上海迎接妻子和最小的孩子，真是满心欢喜的差事。长期的调养使母子二人大为改观，他怀着感恩的心回到汉口的工作中。

另一件喜事，是1866年2月埃文·布赖恩特牧师（Rev. Evan　Bryant）到任。他被派来加入这个差会，并全心投入

为有效服事而必需的预备工作。对杨格非来说，多一位帮手总是意味着更多的工作——不是图安逸，而是多了行善的机会。自1861年开设这个布道站起，他就怀着一个心愿：把它建成传教事业的模范中心。如今，若不在所服事的人群中为医疗需要作些安排，就不算一个完备的大型差会站。在许多地方，开业医生在时间许可的范围内免费帮助穷人；缺少这种帮助的地方，传教士通常也设法学些医药外科知识。然而，差会医院或诊所虽是极宝贵的附属事工，却所费不赀：要建造并维持合适的房舍，聘请医生和助手团队，还要免费分发药品。

想到主曾多次藉医治身体为机会，使灵魂得着光照，杨格非早有打算：将来有一天要建一处地方，向归信者和异教徒一同施行医药外科的救助。然而在此事上，上帝的护理远远超过祂仆人最乐观的期望，并以出人意外的方式促成了此事。他长久以来盼望在传教士住宅附属的花园里建一座礼拜堂，天天向住在城那一头的本地人传福音，也邀请在欧人租界受雇于外国人的仆役们在主日来参加聚会。

1866年4月前后，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罗伯特·麦克斯韦先生（Robert Maxwell）和几位商界朋友，希望从侨民社会得到一些捐助。他们鼓励这个计划，并答应帮忙。但当事情

提到欧人面前时，发现若能在讲道堂之外再加一所医院、哪怕一间诊所，就能募得大得多的款项。这个消息传到杨格非那里，他答复说这想法与他最珍视的计划之一完全契合。两项计划若能同时实现，实在值得欢喜；但当时还无法实行，因为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在当地还没有医生。接着有人告诉他，里德医生（Dr. Reid）很乐意承担医疗部门的工作。次日杨格非与里德医生面谈，发现他也有同样的心愿，几个月来一直在学中文，部分原因正是想以此造福百姓。随后医院的运作方案商定，伦敦传道会的董事们欣然批准，并为这计划捐款。

医院也要兴建的消息传开后，此事得到热烈响应，三天之内，这个小小的欧人侨民团体就为建筑认捐了300英镑，其余捐款陆续而来。楼房建成，家具药品购置齐备，司库手中结余的85英镑足敷前六个月的开支。对杨格非来说，这三个月额外工作的成果极其鼓舞人心，尤其欧人对这机构如此热心，使他期望他们的慷慨支持能持续下去。他写信回家说："我大大欢喜，汉口差会如今各部门齐备了。我们有礼拜堂、学堂和医院，都位于极佳的位置。靠着上帝的祝福，藉着这些方法，我们可以期待中国的这一地区有更大的属灵改变。"

医院刚落成，长江（Yang-tsi）便洪水倾泻而下，城镇和四乡顿成泽国。货物财产损失惨重。数千间中国民房被住户弃守——他们已坚守到最后一刻。然而中国人忍耐而豁达。房子眼看要塌，他和家人，或许再加一两个朋友，却坐在堆起的家具上或屋顶上，半裸着身子，谈笑、说俏皮话、赌博、抽烟、品茶、寻欢作乐，仿佛什么怪事都没发生。在欧洲，这样的灾难会引来一片哀号、报纸呼吁，以及爱心同情与援助的普遍爆发。在汉口，它只激起一丝涟漪。百姓似乎觉得：洪水做完它的工就会退去，留下的他们和从前差不多；两年之内一切痕迹都会消失。这期间，中国人有一碗饭、一袋烟，再加上一副还过得去的胃口，便生死置之度外。至于泥草小屋，他重建的速度比洪水冲垮的还快。他很快又能每天挣一二百文，慢慢还清因水灾欠下的小债。何必灰心，何必觉得被天命压垮？命数是定的，洪水总要来；凭着他那套讲求实际的逻辑——就属世的事而言从无差错——他平静无怨地顺服了不可避免的一切。

杨格非和爱妻的注意力从洪水转到了小女儿玛丽（Mary）身上，她病势危殆。杨格非已不抱她能康复的希望。然而经过三个月极缓慢的好转，她能下地走动了，随后体力迅速恢复。忧虑与喜乐常常相邻：11月1日，又一个儿子的降生使杨格非宽广的心欢喜——这孩子看来会健康强壮。

1867年1月，又一位同工托马斯·布赖森牧师（Rev. Thomas Bryson）到任。为差会工作方便，他虽驻扎武昌（Wuchang），却按各处工作的需要到处协助。此时欧人侨民送给杨格非一件很实用的礼物——一艘舒适方便的传教船。此前他巡访各布道站都雇用中国木船，那些船很少不漏水。

接着在武昌开了一间诊所，杨格非和里德医生每周三前往看诊。诊所非常成功，求诊的人常常多到应接不暇。

不知疲倦的卢向阳在汉阳（Han-Yang）开设了一处布道站，经费由汉口的本土基督徒决议承担。一日，一位官员在他讲道时出言侮辱，百般设法激他争吵，未能得逞。接着那官员说他是反贼，命他跟自己去见上司。卢向阳答应同去；不久那官员放他走了，劝他以后不要再讲道，他回答："不，我必须传道。"他回到布道站连续讲了好几天道，好向百姓证明那官员说他是反贼的话是假的。第三天，那官员回来向卢向阳为自己的无礼道歉。这位传道人的勇气和成功使传教士和本土教会都大为欣慰，会员们在1867年这一年里都殷勤作工。

杨格非报告教会增加了五十一位会员，还有许多人在预备中。1862年受洗的成年信徒十人，1863年十二人，1864年

十三人，1865年十一人，1866年二十二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五十一位中有十三位是妇女，其中十一位是归信者的妻子。传教士无法直接接触妇女，六年来杨格非一直努力让归信者明白：有责任把妻子带到福音的直接影响之下。长久以来，要他们像基督徒那样感受和行事实在看似无望，他几乎要灰心。他们总说国情风俗与此相悖，妻子的感受——他们自己也不得不尊重——也反对这样做。去礼拜堂、与男子一同公开敬拜，不仅妻子，连全家都会被人轻视。他们说，眼下先在家里教导妻子；慢慢地国人的观念会改变，到那时公开认信、参加公共敬拜就容易又稳妥了。

1866年，杨格非察觉到这方面的动向；这十一位归信者的妻子，正是他五年努力的初熟果子。他满怀希望：一两年内，汉口城内外所有归信者的妻子，或许还有其他女性亲属，都会被带进教会。这些新归信者中，不少是普通会员影响的结果。木匠任吉甫（Jeu-ki-pu）就带了七个人进来。他做了五年热心的会员，虽是穷人，却常供米给工人们，免得他们在主日做工。在他努力得着成功之前，亲友们都以为他中了什么邪。他们说他什么都不做，只读新约圣经、祷告，跟人谈灵魂和救主耶稣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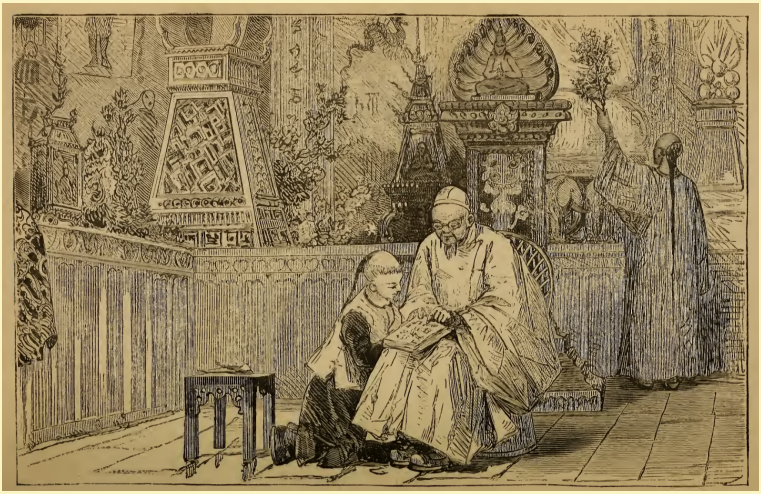
一个有趣的归信例子，是一位年轻的下级官员：他带着师爷和几位朋友走进礼拜堂。杨格非见他们是有学问的人，便把话头引向他们，见他们全神贯注，很是欣喜。下周一，那官员竟走进他的书房要求受洗，令他大感意外。此人是四川（Si-chuen）人，在四川见过不少天主教徒。有朋友邀他去听杨格非讲道，他说去也没用，因为天主教不许外人进去。经人保证汉口的"洋教"不同，又读了人家送他的一本杨格非的小册子，他便和朋友去了。他得了许多书，很快把内容都读通了，对基督教表现出极深的兴趣。不久他带着教会恳切的祷告回到四川的官任上，愿他在传播新信的信仰上得着成功。

同时被接纳为会员的，还有一位从四川来的医生。他和大多数本土郎中一样，常年游走四方，随身带着家传的药方和秘方。在四川时，一本新约圣经落到他手里。天主教徒告诉他这是本危险的书，不该读。他却不信这话，想不通：明明载着他们自己信条基本要道的书，为何说危险。到了汉口，他想去听听聚会，看自己的难题能否解开、疑虑能否消除。杨格非不会轻易忘记与此人的初次相遇。走进礼拜堂，只见他和余吉方（Yu-ki-fang）正激烈争论：医生提出他的疑难，老余则纳闷，这么显明的真理，通情达理的人怎么会有疑难。杨格非见两人谈不拢，便站起来问他来礼拜堂做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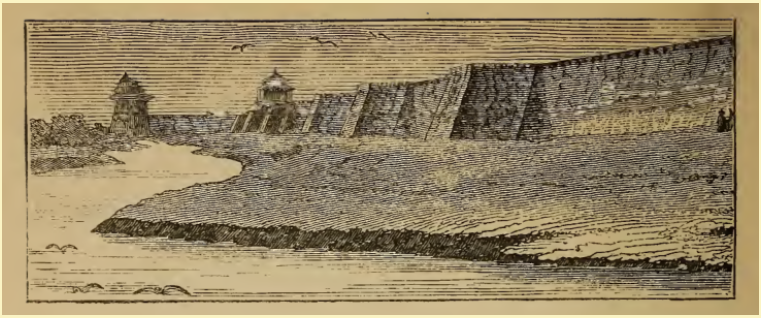
么：是来挑剔，还是来寻求真理。他向杨格非保证，唯一的目的就是消除疑虑、坚定确信。杨格非说："那么，你尽管提任何问题，放心，你说什么都不会得罪人。"

他立刻显出对此深思熟虑过。"你们说基督的降生是神迹，但神迹可能吗？有必要吗？若说有必要，为何独独在祂身上有必要？就算承认可能、承认必要，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基督的降生真是神迹，而这故事不是传说，不比其他许多类似传说更值得相信？"这些是他问题的一斑，听起来仿佛他读过自然神论的书。他似乎对杨格非的回答满意，但当时也没指望他再有什么下文。不料下个主日他又出现了，不久便前来要求受洗，说正是礼拜堂里的那场讨论消除了他的疑虑，使他确信基督教是真理。

以上是那一年加给差会的五十一名归信者中的几个例子；不难想见，这样的人成了基督徒，无论谋生到哪里，都会成为热心的传道者。



图八：宝塔中的讲道——中国宝塔内部



第六章　三千里四川陕西之旅——迁往武昌——访英——归来与杨夫人去世

荒漠岩石啊，即便一片小叶 也能使这荒地显出美好； 当这被烈日灼烤的平原 结出大地最丰硕的果实时， 你们又将成为何等景象？ 当东方的烈日不再灼人， 暴风雨不再肆虐， 这些寂寥的山谷将涌出 溪流、鲜花与喜乐。

——波拿博士（Dr. Bonar）

一八六八年最重大的事件，是杨格非先生（Mr. John）与已故的怀利先生（Mr. Wylie, 英国海外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同工）一同踏上的

一段传道之旅：西行至四川（Si-chuen）省会成都（Chung-tu），再取道陕西（Shen-si）省折返，全程约三千里。此行将永远载入中国新教传道史册，因为它是在汉江（Han）与长江（Yang-tsi）发源的广袤地区开展的首次开拓之旅。在东方，福音从未像这样由一位宣教士亲口如此广泛地传扬开来。

令人遗憾的是，两位旅行者至今都未曾为这次旅行留下记述。杨格非先生归来后，发现有许多重要而缠身的工作在等着他，抽不出必要的时间，把日记中因福音首次在数百座城镇宣讲而产生的丰富而有趣的细节抄录出来。这些省份此前被认为欧洲人无法通行；身为商人的库珀先生（Mr. T. T. Cooper）曾试图取道那里前往印度，结果被迫退回上海。然而宣教士们并不被怀疑有政治目的，得以继续前行。

自始至终，汉口（Hankow）的本土教会都对这项提议的事业表现出最热切的关心，其公开的宗旨是向"你们以外的地方"（the regions beyond）的数百万蒙昧之人传扬福音。杨格非先生和他的朋友怀利先生动身西行前夜，伦敦会（London Mission）教堂的中国基督徒设宴为他们饯行。

让我们想象那一幕！客人们坐在上宾之位，周围是亲爱的本土弟兄朋友。桌上摆着许多大盆，盛满鱼、猪肉、牛

肉、羊肉、粉丝和各类炖菜；餐后还有花生、西瓜、瓜子、奶油蛋糕、饼干等。每人都领到一双筷子、一小碟酱油——酱油是用一种植物（异毛大豆，Soja　hispida）的种子制成的鱼用调料——碟中还放着一把大瓷勺。每个人的旁边还放着一只小酒杯，不过比烟斗碗大不了多少。开席之初，这些杯子都用茶壶斟满热红酒，因为中国人喝酒总是要温过的。随后端上米饭，大家便拿起筷子吃起来，尽力挑出拌在饭里的肉来吃。宴席将近结束时，端上清茶。谢恩之后，宾主互致情意与问候，便各自散去。

四月一日启程那天，许多本土基督徒聚在他们牧师的家里，一直把他送到船上。从那一天起，直到五个月后他归来，他们没有一天忘记为他和他所服侍的人献上祈祷与恳求。宣教热忱的心火从一颗心传到另一颗心，许多人对教会的兴盛怀有更持久、更热烈的关切。在那五个月里，教会增加了二十二人。

宣教士们沿长江大江（the great River Yang-tsi）上行非常缓慢，因为水流湍急。从清晨到深夜，半裸的船夫们吃力地拉着纤绳，拖船前行。江中有些地方水势凶险，常常胜过纤夫之力，把船像卷入漩涡一般打转。偶尔需要另雇人手，多达五十到六十人才能把船拉过险滩。有时纤绳在险滩

中部断裂，船便以惊人的速度顺流而下，几分钟内失去的里程，抵得上几小时的逆流之功。然而有一只仁慈的手掌管着万事，宣教士们得以避开礁石与其他障碍，平安无事。

值得一提的是，船夫们若不到王爷（Wang-yay）——江河的守护神——面前尽了虔诚、献了祭物，便不敢尝试攀登险滩。据说这位王爷在很久以前还是个孩子：祖母病重，母亲杀了儿子做汤给生病的老人喝，老人吃了这道非同寻常的菜，竟痊愈了。

四川一省，在全国其他地方向以盛产奇珍闻名。它不仅有大江、肥沃的河谷与平原、壮丽的山川，物产亦十分可观。因此，在中国东部，人们若看到或问起什么上好稀奇的东西，得到的答复常常是："哦，那是从四川来的。"

长江沿岸有许多沙滩，产金；冬季数以千计的穷人以淘金为生。但江河灌溉的土地，比金子更有价值。旅行者经过的田野，种着种类繁多的蔬菜，还有丰收的稻米。稻米是中国穷人的主食。宣教士们经过时，棉苗刚破土而出。棉花是织布之料，买不起丝绸的人都穿棉布。

另一宗大宗作物是烟草；中国人中几乎找不到不吸烟的，为应付需求，种植的量极其庞大。可叹吸的并不限于烟草！——经过大片罂粟田，花朵赏心悦目，吸食鸦片带来的

感觉想必也令人陶醉；但正如世上其他的诱惑，虽极其愉悦，却必把沉溺其中者带向确定的败亡与死亡。

这一带最奇特的树木是乌桕树，还有一些通体覆蜡的树，远看像大雪纷飞的隆冬。中国所有的蜡烛都用这些树做成，因为佛教禁止杀生，人们不忍用死去动物的脂肪做蜡烛。

这一带的山里满是煤，江岸峭壁上随处可见矿洞。有一处他们发现了数以千计的盐井，深二百到三千英尺不等，从中汲出卤水，熬成盐块。有人告诉他们，离江不远处还有油井和火井。矿气从井口喷出，用管子输送到任何距离。其他可说的还有许多，但说这些已足以证明，四川与陕西二省，实在是一处以美丽和富饶著称的地区。

要在那样古老的国家、与那样慢吞吞、安于现状的人民中住上多年，才能以近乎忍耐和顺服的心承受这种旅行的烦扰。好在屡次的耽搁和停顿，总给随时预备好的宣教士留下传讲福音的机会；加之沿途尽是他们未曾见过的新天地，激发了好奇心。从汉口到重庆府（Chung-Kiang-fu）七百二十一里，走了整整两个月，所见所闻的许多有趣情景与事件，使路程变得可以忍受。杨格非先生在四川发现了许多天主教信徒。在该省的商业中心重庆，他们竟有三四千人之多。

他们从重庆继续沿江上行，六月二十日到达大城泸州（Loo-chow），在那里停留三日，售卖圣经。然而船夫们不肯前行，因为六月二十四日是龙舟节（Dragon-boat Festival），四川全省放假。这个节日是纪念屈原（Keu-Yuen）的。两千年前，中国由几个小国组成时，屈原在楚国（Tzoo）为相。他是楚王的亲族，因正直的品行而遭朝廷嫉妒。其他大臣设下阴谋，用虚假的控诉使他被放逐出朝。屈原为自己忠贞反而遭受如此对待而愤慨，写了一篇抒发忧愤的诗，至今仍为文人所爱读。随后他投江自尽，被一位渔夫看见，报了信；各地居民打捞他的遗体，始终没有找到。为了纪念他的品格，人们年年寻找，持续了好些年；直到约两百年后，一位皇帝下令全国在同一天举行纪念。屈原并未被封为神，也没有什么超出祖先祠堂之外的供奉，但龙舟节的纪念至今为他的名留存。

清晨非常安静闷热，宣教士们在城里漫步。街上行人稀少，人们都穿上了节日的新衣。约三点钟，江岸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数百条船载着乘客来看赛龙舟；城里的显贵们乘坐大船在江上来回巡行，锣鼓喧天，以维持秩序。其中一条大船被派来保护外国人免受滋扰。

到指定时间，评判们在江边落座，五六条龙舟出发了。舟形如龙，以尊崇掌管江河的龙；用桨划动，正是相传当年搜寻屈原遗体时所用的桨法。有青龙、黄龙、白龙、黑龙、金龙、银龙，每条约三十人划桨。船中央站着两人击锣，桨手们整齐地随锣声划动。一条龙口中喷火，冒出浓烟。比赛是从左岸划到右岸，每船派一人上岸，抓一把青草，带回起点交给评判。比赛十分激烈；试艺之后，龙舟们在江面上来回游划，供众人观赏取乐。

他们从泸州沿长江和岷江（Min）上行，到达成都（Cheng-tu）——四川的政治中心，人口百万之城；然后乘轿穿越山区，到达汉江（the Han river）上游一千二百里的汉中府（Han Chung-fu）大城，再取水路下行回到汉口。在这次穿山越岭的行程中，他们的住宿极其简陋，常吃到最奇特的食物。这样实现了一个长久以来的心愿，杨格非先生所得远超他最乐观的期望。他几乎没想到自己能活着回来，归来的第二天写道：



图九：中国陕西省汉中府城门

"我最大的愿望是，神能容许我一睹成都，那时我便可以安然死去，知道我在那遥远的大城留下的坟墓，会激励别人奉主的名来接替我的工作。在那里传福音时，我感到真正宣教精神的一阵激动，这比多年平淡的生活更宝贵。惟愿这在我里面成为恒常的心意、不息的激励。看待工作有两种眼光：一种是谨慎的眼光，一种是勇于进取、有所作为的眼光，外邦人的伟大使徒正是后者最大的典型和代表。现代多数宣教士满足于前者，我却渴慕后者。董事会要我回国；但只要差会不可或缺地需要我在场，我断不离开，无论迟延会带来多少牺牲。我的心被汉口差会和神在这地区的工作充满，容不得我这样做。我以从未有过的方式感到，长江和汉

江的流域已奉基督的名被占领，我要为沿着这两条壮丽江河居住的数百万宝贵灵魂而活、而死。"

令杨格非先生大感欣慰的是，成都如今已被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宣教士占领多年，重庆也即将由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接手。

杨格非先生归来不久，希勒医生（Dr. Shearer）从英国抵达，担任差会的医疗宣教士。他除了主持医院，还在武昌（Wuchang）和汉阳（Han Yang）设立施医所，每处每周施诊一天。他的到来还促成了另一项对差会整体工作有重要影响的变动。杨格非先生把自己的房子让给希勒医生居住，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在汉口租一座民房，花大笔钱整修——既不卫生，一年后又得腾退；要么迁往武昌，在差会原有的产业上略加改建和增建，花费仅为汉口租房年租金的三分之一，便能同时容纳一位已婚和一位未婚宣教士。除了健康和费用之外，还有许多理由支持后者。

杨格非先生早已渴望给同工布赖森先生（Mr. Bryson）提供他真正需要的帮助，也渴望看到一间兴旺的教会在武昌建立起来。那座大城虽是重要而广大的工场，却仍是一片处女地，几乎未曾犁过一道沟。唯一的工人是一位经验不足的宣教士和一位本土牧师。在杨格非先生回英国之前，他能以

其经验之重，助武昌差会彻底建立并稳健运转，是十分可取的。这一切都已考虑周全，必要的修缮和改建也已完成；这时董事会又一次邀请杨格非先生访英的函件到了。若顺从这一要求，就等于牺牲上述为武昌工作所作准备的全部前景。于是访英之行推迟，杨格非先生住进了武昌。他仍在每周日上午到汉口讲道，并每周两三次往返汉口与汉阳。

为扩展武昌的工作，在一条主要商业街上设立一间讲道所是必要的。宣教士们的努力遭到当地士绅阶层毫不掩饰的反对，他们威胁说，谁敢给外国人哪怕一点点帮助都不行。官员们再次暴露了他们的无知：他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神的道却不被捆绑"（"the word of the Lord cannot be bound"）。于是那"银亮的声音"又在街头巷尾响起，福音在每条大街小巷公开传讲，传给那些既没时间、也不愿来礼拜堂听道的人。

就在这项艰巨而成功的事工进行之际，董事会的一封信如同炸弹，落在这一小群忠心工人中间，信中说希望放弃武昌的工作。对这奇怪的暗示还将信将疑之际，杨格非先生写了一封信，有力地陈述了武昌的成果、优势和前景。一周后，又来了一封更坚决的信，附上通过的决议，以非常明确的方式命令撤退，并指示出售差会产业。

杨格非先生不肯撤退，回信的措辞有理有据、无可辩驳：那块地和建筑几乎完全是用汉口的欧籍人士赠给他的钱购买的——他们本是要送给他个人的礼物，他觉得不能收，便请求拨给武昌，就是他刚刚成功立足的地方。在为触及这段个人经历表示歉意的同时，他表明武昌在他心中极为珍贵，放弃它会让他心如刀割。杨格非先生拒绝参与执行这项决议，不是出于违抗的精神，而是出于深切的信念：在这个艰难的地方劳苦了五六年之后，把已经成就的（就外在情形而言）拆毁，在他看来只能是罪。

这些陈述达到了预期效果。当年年底之前，杨格非先生收到了董事会批准武昌差会继续存在的通知，也批准了把产业改作住宅的方案，并拨款九十英镑建造一间讲道所。这些嘉许还附带着一个表示：董事会希望在两三年内增加汉口的欧籍宣教士人数。

一八六九年，这些城市遭遇大水，水位比一八六六年高出二英尺。杨格非先生一家一直守在武昌的房子里，直到水涨到离地板只有三英寸。房子没有楼上，他们接受了一位汉口老友的好意，搬去他家暂住，直到洪水退去。这次大水的一个奇观，是水中出现了大量小鲱鱼（sprats）；差会院落里的仆人常常用网在院子里通宵捕鱼，大有收获。

大水的结果是，十万多无家可归的灾民住在汉口附近的山上，靠富裕的乡亲赈济。一位官吏为人虔诚，给他那些贪婪的同僚立了好榜样，对贫苦的同胞极为仁慈。像许多其他善良的外邦人一样，这个人让杨格非先生百思不解。他们虽有美德，却似乎离神的国最远。他只能这样解释：他们的虔诚是建立在自义之上的；当被告知要借着信耶稣基督寻求称义时，他们就动了怒。

在这段传道工作受阻的日子里，杨格非先生有一件喜事：九月二十日女儿出生；一个月后，他带着全家搬回武昌的小屋。那屋子不仅狭窄，而且不挡风寒，一八六九至七〇年冬天全家受冻不轻；孩子们又出天花，更添艰难。然而尽管处境困顿，杨格非先生仍奋力工作，常一天讲道四次，长途跋涉。

他盼望重访英国已有数年，但逆境使他不能成行。这个冬天他又失望了；但他以一贯的智慧，设法使迟延成为工作的助力。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有了实施的机会：他多年来一直盼望看到信徒们主动站出来，免费担任传道人；如今有五人以令人欣喜的方式这样做了。晨间礼拜后，每人到自己选定的村庄去主持一次礼拜。一两周后，杨格非先生逐一陪他们前往。他写到其中一人：

"他是基督徒父母的儿子，九年前我为他施洗，那时他还只是个孩子。今天听他讲道，我心里真欢喜。他的见解非常清楚，热忱十分明显，举止极其和蔼动人。"

在这次聚会中，杨格非先生遇到一位半开化的外邦人，与他谈论耶稣和祂的救恩。不久之后，他欣喜地听到这个人正以惊人的清晰和能力，向他的外邦同胞传道。

在村里，杨格非先生还与其他外邦人有过有趣的谈话。他为他们的心灵黑暗而叹息，说他们只追求今生坟墓这一边的东西；对来生的盼望，不过是再投生到世上，处境比今生好一些，又怕投生成为走兽或爬虫。每家门口都贴着两尊高大的门神画像和符咒，上面还挂一面镜子，好让魔鬼看见自己而受惊。

一八七〇年九月三十日，杨格非先生和全家平安抵达伦敦，乘法国皇后号轮船（ss. Imperatrice）至马赛（Marseilles）上岸。离开上海时他们身体都不好，航程中大有好转；经过十五年精力充沛的宣教工作，杨格非先生仍觉健旺。他的归来不仅使亲友欣喜，也令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董事会和支持者们欢喜。他为中国所作的雄辩呼吁极具感召力。听他滔滔不绝、抑扬顿挫的人，很少想到英语不是他的母语。而在他热情的听众中，最

热烈的要数他在威尔士（Wales）的老朋友和仰慕者：少年时他赢得了他们的爱，抓住了他们的心；如今他男子的力量征服了一切，威尔士感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声音正在唤起她最美好、最高尚的情感。

杨格非先生起初住在马基纳莱斯（Machynlleth）。岳父母住在那里：德高望重的大卫·格里菲斯牧师（Rev. David Griffith）夫妇，五十年前刚启程前往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一八三五年被残暴的拉纳瓦洛纳女王（Queen Ranavalona）驱逐出境。他最亲密的同窗、约西亚·琼斯牧师（Rev. Josiah Jones）也在那里牧养一间重要的教会。于是，他这段当之无愧的休假的头几个月过得很惬意，还时常作为差会的代表到英格兰各地巡回。一年一度的威尔士年会，即赛曼法（Cymanfa），那年在马基纳莱斯举行，杨格非先生用威尔士语在露天向约五千人讲了一篇有力的宣教道。但一八七一年他不得不迁往斯旺西（Swansea），为子女求得更好的教育条件。

一八七二年，应董事会之邀，杨格非先生在伦敦会年会上讲了年会讲道，后来以《中国的盼望，或：行善不可丧志》（Hope for China; or, Be not Weary in Well-doing）为题出版。

在英国为差会做了许多工作之后，杨格非先生准备动身。他因杨夫人（Mrs. John）身体虚弱，超过了通常的休假期又多留了一年。夫妇二人都急于回去；杨夫人觉得，即使余下的日子不多，也最好花在教导她深爱的中国妇女，让她们多认识一些耶稣的爱上。

一八七三年一月，董事会在会上与这位敬爱的朋友深情话别。杨格非先生向董事会致辞，为董事会开脱了可能归咎于他们的责任，他说："他们曾对我说：'杨格非先生，我们不能要求你去；但若你觉得本分催促你去，我们只能祝你一路蒙神引领。'"他这样做完全合乎杨夫人的心意，也已就她的健康咨询过医生。"杨夫人比我更有宣教的热忱。"

二月八日，他们在利物浦（Liverpool）登上赫克托号轮船（ss. Hector）。那天天气寒冷，杨夫人受了风寒，从此一病不起。她的喉咙、口腔、舌头渐渐起疱红肿，连喝水都成了痛苦的差事。红海（the Red Sea）的酷热最难熬；熬过那段煎熬，她的痛苦依然剧烈。她以奇妙的忍耐承受了一切。她已预备好离世，却直到最后仍盼望、相信自己能见到中国，再劳苦一段时日。

去世前一天，她对杨格非先生说她会好起来，又说："我在我救主的手中。我已把自己交在那里，让祂按祂认为最好的待我。你说祂会接纳我吗？我很不配。"

丈夫回答："会的，我亲爱的，祂早已接纳你了。"

"祂已经接纳了，"她回答，又谈起要比以往更热心地投身宣教工作。

那天夜里大半时间杨格非先生都陪着她。他刚退下休息不久就被叫去；但她温柔的灵魂已经离去，正赶上东方壮丽的日出初升，照亮轮船驶入新加坡（Singapore）港的航道。

起来，飞去吧，如清晨的朝露，
从大地升腾，归回太阳的家乡；
愿我就这样悄然、温柔地离去，
只因所作的事而被记念。
不是我自己，乃是我在世所讲的真理，
不是我自己，乃是我在世所撒的种子，
将流传万代；关于我的一切都被遗忘，
唯有我讲的真理、我行的事留存。

她葬在新加坡的欧人公墓；能把她宝贵的遗体安放在那美丽的安息之所，对悲伤的丈夫是一种安慰。

杨格非先生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抵达汉口。归信者们待他亲切体贴。英国人无法想象这些可怜的人对杨格非先生的爱戴和敬重有多深。如今他们的心满溢出来。在主日的圣餐礼拜上，领圣餐之前有几位发言，但一提到他们"师母"（"Teacher-mother"）的名字就都哽咽了，全场会众泪流满面。

杨格非先生重新投入工作，虽然有时孤独悲伤之感极为强烈。各处差会的进展都令他十分欣喜。临行时他曾劝勉一些人归向基督，如今他们已经决志，得胜地进入了大赏赐。善良的老余吉方（Yu-ki-fang）已安息，爱他的弟兄们亲自送他入土，不肯让一个外邦苦力碰他可敬的遗体。其他人则坚定地继续前行。

这时，女儿玛丽（Mary）的一封美丽的信使杨格非先生的心得到安慰。"我亲爱的全是我的女儿，"这位小主妇说。信上写道："亲爱的爸爸，我为你很难过；我多想在你身边安慰你。我要赶快学习，到你那里去，为你看家。亲爱的妈妈很幸福，她不再有痛苦。耶稣在安慰你，安慰外祖母、弟弟们和我。祂给我们工作做，不让我们停下来只顾伤心，而是像祂当年激动亚伯拉罕一样激动我们。"

汉口的本土基督徒多年来一直自己在夜间露天讲道。一八七三年七月，杨格非先生参加了一次这样的聚会；站在大群听众中间，开设夜间礼拜堂的责任沉重地压在他的良心上。在教会会议上，他向信徒们提出这事，招募志愿者。呼吁得到迅速热烈的响应；夜复一夜，总有七八位最优秀的弟兄在传讲福音。起初虽显稚嫩，他们很快成长为出色的讲道者。他们从医院礼拜堂开始；但觉得那里施展的余地有限，便想要位于城中心的大城礼拜堂。

其他差会的信徒听到伦敦会弟兄的事，也向各自的宣教士申请许可，开展同样的工作。聚会常常人数众多，多是白天不能或不愿来的人。众教会都因这努力而振奋，给外邦人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讲道者们可以告诉那些把基督教说成"吃教"（"rice-eating religion"）的人：这是诬蔑；他们不但不靠教会养活，反而免费服侍，连点亮礼拜堂的灯油蜡烛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外邦人很快看明白了，对基督教会有了更高的看法。

教会如今有二百多名会友，每月都有增加；但这绝不是所做工作的全部成果。汉口纯粹是个商埠，许多归信受洗的人都回到家乡，常是遥远的省份，本堂的人数并不能反映实际成就。有些宣教士为此惋惜；留在宣教士指导之下当然更

安逸，或许也更稳妥。但杨格非先生坚持认为这是优势，那些远方的弟兄是先锋，很快会有传道人跟随他们的脚踪而去。这样，从"帝国的心脏"（"the centre of the Empire"），光和生命流向每一个省份。

一八七三至七四年冬天，汉口建造了一座新的宽敞医院，主要靠中外人士的捐款，耗资一千三百五十英镑。里德医生（Dr. Reid）在一八七〇年希勒医生退休后重新接手这工作，奋力主持，直到一八七五年六月麦肯齐医生（Dr. Mackenzie）到来。属灵的果效也很大，因为所有宣教士每天都抽出部分时间在病人中劳苦。



第七章　文字工作

"真理无一时代能长大而超越,
亦无一时代舍得
与往昔久经考验之智慧分离,
与那历百代筛炼之言语分离,
其上印着千秋之印记,
自庄严先贤之口相传而下——
他们在更庄重的学府中学得智慧,
在比我们所知更剧烈、更惨痛的
冲突之时代中得来,
不似今日这轻浮的假日,
真理与谬误不过是口味之别,

是时尚的赝品，年年更易。
守护那些古井罢，那活水的泉源，
我们的先祖曾饮之而得苏醒。"
——波拿博士（Dr. Bonar）

以英文写作而论，杨格非先生（Mr. John）的文风，简洁与明晰兼得。从他的著作可见，他写作并非为求个人声名。宣教事工及其发展的途径与方法，是他一贯的主题。"其论述虽直切要点，坦率而富洞见，却给读者这样的印象：这些著作不过是旁出的辅助之作，为他一生的大工效力。"

1859年，他写了一篇很有价值的论文，题为《中国人的伦理——论性与罪之学说》（"The Ethics of the Chines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Doctrines of Human Nature and Sin"）。这本小册子显示他对中国伦理学家的著作颇有研究，并阐明了他们在中国哲学发展中的地位。

他在1872年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年会上的讲道，是一篇极有说服力的宏文，旨在激发人对中国"怀抱希望"（"Hope for China"），因中国对基督在世之国度的态度令人鼓舞。后以该题广泛刊行，成为小册子。见当时许多人对宣教的热心渐衰，他在1882年离英之前，写了《为中国请命》（A Plea for China）；又有《中国之诉求

与呼召》（China, her Claims and Call）。同时问世的还有一本极有价值的小书，题为《宣教工作的属灵能力》（Spiritual Power for Missionary Work）。这是关于圣灵的工作与能力有力而有效的论述，无疑是杨格非先生亲身经历的结晶——他深知没有神的帮助，宣教工作徒劳无功；也深知属灵工作的果效，唯有出于圣灵的大能、靠圣灵的大能维持，才能长存。

杨格非先生的名字之所以在中华帝国（the Celestial Empire）如此广为人知，主要靠他的文字工作。世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给宣教士以如此大的动力，借印刷机传扬真理。全帝国通行同一种文字；同一本书，不仅凡识字的中国人、无论说什么方言，都能读懂，连周边各国的知识分子也能读懂。民间识字的人数非常多。每个村庄都有学塾，城镇有许多学校，大城市还有书院。各处都极重教育。识字人口的实际比例，恐怕永远是个没有定论的问题，因为各地差异极大；但想到四亿的庞大人口，说一本中文书能被世上比任何其他语言都多的人读懂，一点也不过分。中国人对文字怀有极大的敬意；凡到手之书都细细研读，虽未必赞同，却很少毁弃糟蹋。通行的书多为久远之作；新书在民间几乎无人知晓，因此一出便大受欢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纸张

与印刷都极便宜，用印刷机大可广为使用，而不致花费过巨。

这些有利条件之外，也有一个严重的难处，就是中文之难。就这一点而言，中文独一无二；没有其他语言文字可与之比拟，要掌握它，需毕生之功。中文用奇特的方块字书写，大多数人即便只在茶叶箱上见过，也都面熟。这些字不像我们的字母是表音的，而是表意的；字音，即字的名称，随方言而异，但所表之意永恒不变。这正如我们的数字1、2、3等，任何欧洲人见了都懂是何意，尽管各国语言中名称不同。中国人每个意念都有一个不同的字，仿佛整个语言都用数字写成；于是操不同方言的人，虽口不能通，却能同读一本书，了然无碍——正如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俄国人，看到250这几个数字，立刻都懂是何意，却听不懂对方怎么念。只要学会每个字的意思和组字成句的方法，完全不懂一句中文口语，也能用英文读懂中文书。但这绝非轻而易举的任务，因为字典收字约四万，常用者不过六千左右。

中国人称他们的书面语为文理（Wen-li），即"文言体"（"literary style"），外国人常称之为"古典体"（"classical style"）。这种文体与任何口语方言都不对

应。在别国，书面语与口语相同，听人朗读书，与自己拿书看页，同样明白。但文理是专写给眼睛看的，不是写给耳朵听的，所以中国读者必须看到书，跟着听人读是跟不上的，除非事先已熟读。原因在于：字虽极富，字音却极贫。在官话（Mandarin）——最通行的方言——中，只有四百十一个音，于是每个音须代表许多字，有的竟代表几百个，意义各不相同。我们很难想象一种只有四百十一个音、即四百十一个词的语言怎么说得出口；有趣的是，中国人对英文也有同样的难处：他们不明白只有二十六个字母的语言怎么写得成。他们以为这必是一种贫乏的语言，常请宣教士教他们英文，因为"一坐就能学会——只有二十六个字母！"

两边的难处都用同一个办法解决：我们把几个字母拼成词；他们说话时，把两个或更多的字连用，一个音节不够，就加字成词。例如fu是"父"，也是"妇"、"斧"、"福"、"夫"、"符"，还有许多别的意思。写出来，一个字各表其意，互不混淆；说出来，就必须另加一字以免混淆。于是"父"变成"父一亲"（fu-tsin；父，亲属），"妇"变成"妇一人"（fu-jin；妇，人），"斧"变成"斧一头"（fu-tan；斧头），"福"变成"福一气"（fu-chi；福，气氛），余类推。记住书面语（文理）与口语之别，就容易明白：读者一目了然的，听者可能全然不解。

口语中文与文理一样，随时可以书写印刷，因为多数方言的每个音都有对应的字；但中国人自己不习惯写口语，除非有意摹写说话，如小说、戏剧。他们的著述、书信、报纸，几乎全用文理。赘字于目观无益，他们便力求删汰，深信"文言体"之美，全在愈简愈好。然而宣教士发现，各地方言口语本，于传道大有裨益：略识字的人读之更易解，还可朗读给不识字的人听；于是他们备办了大量这种所谓"白话体"（"colloquial style"）的书。这类书不像文理书通行全国，只能在所用方言通行的地区使用。其中多数是官话本，官话为四分之三中国人所通晓。

杨格非先生在文字工作上，严格限于编著与中国传福音直接有关的书籍单张；尽管对汉学家（sinologues，指精通中国文学者）而言，旁骛他枝的诱惑异常之大。中国本土典籍中，史部、子部仍有大量著述，若译出供外国学者研读，必受欢迎，译者也将大得声誉。另一方面，本土士人中，急于了解西洋科学与技艺者日增，若有人用他们的语言为他们备办这方面的书，必大受赞誉。为东西方传播知识而劳苦，是崇高的呼召，投身其一者都当受尊敬；但杨格非先生把他的才干献给了更高的事——专心一志，使福音为中国人所知。这在世人眼中或不甚受赏识；但正如永恒大于时间、神的智慧高于人的学问，这一志向远胜那一志向。

他的第一批单张发于1860年，那时他到宣教工场已五年；自此不断增补。华中圣书会（Central China Tract Society）的目录收录他的著述三十余种。许多已被其他圣书会采用，每年在全中国流通的他的出版物超过五十万册。书名即见其性质，其中有《德慧之门》（"The Gate of Virtue and Wisdom"）、《齐家八道》（"Teaching the Family in the Eight Way"）、《天路指南》（"The Guide to Heaven"）、《福音大纲》（"The Great Themes of the Gospel"）、《救世真主》（"The True Saviour of the World"）、《求福真道》（"The True Way of Seeking Happiness"）、《论真神》（"The Truth concerning God"）、《论重生》（"On Regeneration"）、《论复活》（"On the Resurrection"）、《论赎罪》（"On the Atonement"）、《论悔改》（"On Repentance"）等，无须再释。他细察各阶层的需要：有的专为士人编写，在许多省的省会乡试之期广为散发；有的适于在民间广泛流通；为教导初信者及公用崇拜之用，他还备办了通俗的问答与圣诗集。皆用文理体写成，不仅通行全国，在朝鲜、日本也大有价值。下引华中圣书会报告书的摘录，可见其效用：

"这样的圣书会所成就的善工，今生我们永不能尽知，但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感谢神、壮胆前行。一位积极襄助本会工作的同工来信说，他收到许多远省来信，询问本会出版物所传教义，寻求更多的亮光。他又说，一次在湖北乡间，向一大群未信者讲道时，发现一位听众对基督教义颇为熟悉；宣教士连问数题，他都对答如流，随后主动说，他的知识得自在汉口（Hankow）买的一本三分钱的小册子。后来问到一题，这位小册子的学生实在答不上来，人群中却有一位读书人代答，答得头头是道，可见他对我们所传的真理，比前一位知道得多得多。问他从何得知，他说读过一本单张——一本大的，还说出本会另一出版物的名字，又说他那一带的读书人，这本单张人人都读过。"

"宣教士问：'书上所教的，你信吗？'他答：'除几处外，都信；总的说，我们认为好得很。'"

"这样的事实本身，足证工作的价值，激励我们更热切地沿同一路线奋进。但还有两件趣事为我们所知，连同上文所记，当使人更充分认识这最重要的基督教事工之一。"

"在汉江（Han River）支流府河（Fu Ho）岸边，有个小市镇名叫梁河口（Liang Ho K'eu），宣教士往返于三十里外的府城德安（Teh Ngan），常在此停留，传

讲福音，分发宗教书册。其中一本单张，落入一个收废纸的人的篮子里，正要被拿去烧掉，被当地一位店主看见，抢救下来，带回家读。这人先前买过一本新约，读不懂，搁置一旁。读了这本单张——恰是《智慧之门》（"Gate of Wisdom"）——神的话向他豁然开朗，此前于他原是封着的书；蒙神赐福，他被激动，起了宗教上的关切与寻求。他到汉口，寻到布道所（Mission Chapel），对救恩之道愈发感兴趣；终于在汉口和德安受教之后，在德安被接入基督教会。"

"汉口一位本地售书员（colporteur），因盖房子，被迫把书摊搬到别处，最后摆在一位商人家门口。起初那家主人待他颇为无礼轻慢；但'回答柔和，使怒消退'（箴十五1），商人渐渐平息，不但不再逼迫老人，还买了他的几本书。几星期后，售书员意外接到商人邀他进屋喝茶的帖子。谈话转到书的内容上——看来商人细读过——不久老人便恳切地向这位从前的逼迫者传讲福音。这第一次谈话引出以后多次同类的谈话，商人也接受了邀他参加布道所主日聚会的邀请。这位初醒的慕道者到布道所聚会不过几星期，一天，众邻惊见他把全家偶像搬到街上，当众用火试验——试验的结果，不用说，偶像立成灰烬。两个月后，商人听说教会会员例行捐款支持崇拜等费用，便表示愿每月捐洋五角，又

说：'我已来聚会两个月，已欠一元，乐意补交。'不久他被接入教会，他光明的面容、恳切的态度，常激励他的宣教士弟兄们。"

杨格非先生的中文造诣在单张中表现得如此出色，以致有人鼓励他尝试用同样的文体重译圣经。距当时通行的文理译本问世，已过去三十多年——在中国宣教史上，这是很长的一段时期。那译本的译者才具卓越，但在早期，他们不可能像后继者那样精通中文的表达能力；后继者有前人的劳苦为基础，有更好的学习机会，又有更长久的经验为助。想到他们当时工作的艰难，奇的不是他们的译本有瑕疵，而是其卓越竟能沿用如此之久。对那译本主要的异议是：译者追求最高的古典文体，用了合宜却生僻的字，又因文体所限，造句异常简古，结果除了最博学的士人，无人能懂。这弊端感受之深，以致宣教士几乎完全弃而不用，改用各地白话译本，尽管本地人嫌弃白话，不肯视为"文学"。于是需要一种文体简易的文理译本——既合乎本土的文学品味（在中国这样保守的国家，逆此品味而行是无谓的愚行），又浅显易懂、绝对准确。

应苏格兰圣经公会（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之请，杨格非先生于1883年承担了这一重任。工

作之巨，难以想象；但他靠着不懈的劳苦，完成了全部新约和部分旧约，新约又经仔细校订，校订中有几位最有能力、最年长的宣教士热心襄助。译本分部刊行，新约于1886年完成，赢得一致赞许。通行无远弗届：自长城以南至安南（Annam），自缅甸（Burmah）边境以东至黄海。士人赞赏，农夫工匠读之无难。需求之多，超过其他中文译本的总和；已在民间流通的单行本与新约约七十五万册，每年发行约二十三万册。他在中国的声誉，可见于1887年5月13日《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一篇书评：

> "我们相信，永久的标准中文译本，必须在高古典与低白话两极之间取中道。须有权威之风，又浅显易懂；须赢得普通读书人的尊敬，又适合他们的程度。须不叫外国宣教士或中国信徒费太大气力学那确切的成语或意义。须不含任何一地的土话，而用通行全国的浅近文言，即近年来本土报纸多所培养改进的时文体。须不带注疏，以免成为引入私见或偏爱教条的凭借。须是直接从原文译出的原创译本，而非转译之译本。但篇幅不许我们尽言标准译本当如何；姑且说，我们认为杨格非先生新译的新约修订本，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最可嘉的一步，在一切必要或本质的点上都极近鹄的。虽或仍可改进，显然已足应中国各地布道工作的现时需要。毫无疑

问，这一译本必为广大宣教士所接受；当然，挑剔者必仍抱残守缺，宁用自己或同宗的译本，虽远不如人。在此祝愿杨格非牧师健康长寿，能照新约的体例完成全本圣经，亲见它对一国的宗教与文学发生他所热切期望的影响——这就是他为这艰巨劳苦所求的全部报偿。"

这样的摘录易于倍增；但既同调，一引最近的一篇——《纽约世界传教士评论》（New York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或已足够：

"杨格非牧师（Rev. Griffith John）在汉口所备的新约新译本，据说胜过其他一切译本；深信它将被采为全中国合一译本的基础。这样一本书，将用三亿人能懂的语言写成。中国与印度不同，实在只有一种语言；圣经若能满意地译成这种语言，结果将是世界前所未见的。这本书从前行过奇事；将来无疑还要行奇事。"

这不是虚妄的期望。神的话语和基督教书籍广泛流通，中国亿万人民正在被熏陶。远近人民渐渐熟悉基督真理，耶稣之名与佛（Fu，Buddha）之名同样广为人知。孰胜孰败，迟早无可置疑：后者必将消逝，惟耶稣独王中国。一人能为促成这美果做多少，从杨格非先生身上可见：每年发行

的冠他译者、著者之名的圣经单张，已近百万，不久必过之。其影响谁能估计?

改变必来，最了解人民的人对此速至最有盼望。到那日，他和一切为催促其来而劳苦的人，必得赏赐；与这赏赐相比，人的称赞、学会的嘉许，都将黯然无光。

杨格非先生在文字工作上至今所用的，虽是文理体——通常称"浅近文理"，以别于高古典（高古典其实一点也不浅近）——但他对官话白话，即京话，同样精通；英国各圣经公会（British Bible Societies）深信他译才无双，最近联合请他备办官话本圣经。中国各地宣教士也不断催他供应注释书、手册和各样急需的著作。世上没有比中国更大的宣教工场，这一事工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杨格非先生是其中一位高效不倦的工人；凡知他已成就之工的人，都切切祷告，愿他长寿，得以借口笔继续推进基督在黑发之民（the black-haired race）中的事业。他一生所成就的，已非常人所能及，所做的无不美好；但比起中国待做的工，不过沧海一粟。我们切望他能再接再厉多年，也祷告他的榜样和中国大需要的知识，能感动多人步他后尘，献身这至高尚的事业。

"刚逾钢铁，
是圣灵的宝剑；

疾于飞矢,

是真理的光华;

胜于忿怒,

是爱，爱能降服。"

——朗费罗（Longfellow）



第八章　再婚——被异教徒用石打——被圣灵充满——继续成功——杨夫人去世

那些蒙福地彼此交托的心灵，
在天国的交会中共享喜乐，
坦然无畏地倾吐
同情引以为己任的忧愁，
便从今生的团契中日日汲取
更丰盛的光明与力量；
路途的坎坷与漫长便渐被忘怀，
同心合力迎战一切反对者，

一心同德，志趣相合，
彼此勉励，奔跑这属天的赛程。

一位宣教士的妻子能为丈夫提供的服事与帮助，以及她向民众直接作的工，其价值在任何地方都不及在中国为大。杨格非蒙福拥有这样的扶持达十八年之久，一旦失去，便深感其痛。他所爱甚于生命的圣工极其需要这样的帮助，他也深知，若再请一位女士为妻，她将肩负何等沉重的责任。因此，一八七四年十月，当他与美国监理公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of America）詹金斯牧师博士（Rev. Dr. Jenkins）的遗孀结婚时，他为汉口（Hankow）布道站带来的增援，其价值实难估量。寥寥数语，即可说明这位女士是何等胜任这一职分。

杨夫人禀赋超群，才德兼备，实属罕见。她身材高挑，仪态优雅，轮廓分明的面容上，罕见地融合了聪慧、坚毅与温柔。她体格强健，能作大量的工而不觉疲乏。她似乎兼具马大的务实本性，与马利亚的默想气质和属灵洞察力。她坦率亲切的性情，吸引一切与她接触的人；而她信守一切承诺、忠实履行友谊的各项本分，又使众心归向她。她还有一种能激发所识之人美善品格的本领；只要确知对方的爱与友谊是真诚的，她便能无限量地包容人的怪癖——即使对方性

格中有令人不快之处，她也会紧紧抓住不放。这一社交特质，使她在与水手和中国妇女交往时大得助益。

詹金斯夫人（Mrs. Jenkins）早在一八五五年便是最早欢迎杨格非的人之一；一八七三年，当他在丧妻的悲恸中拜访她和上海的其他朋友时，正是她属灵的交谈安慰了他，激励他振作起来，在汉口奋力作工。詹金斯博士于一八七一年去世后，她曾回访美国，与早年结识的基督徒朋友相交，大蒙祝福。她经历了深切的省察，昔日对在基督里完全生命的渴慕以如此强烈的力量复苏，以致天上的鸽子——圣灵——降临在她身上，成为圣洁与能力的灵。

詹金斯夫人如此重新受洗，回到中国，求神为她预备合适的工作园地。一天，她正前往上海联合礼拜堂（Union Chapel），迎面遇见约六名水手，每人腋下夹着一瓶威士忌或老汤姆琴酒（Old Tom）。就在那一刻，她心中对水手生出特别的负担，自问："这岂不是神交给我作的工吗？"她向他们说话，路人惊讶地看见这些大海的健儿把酒瓶扔进路旁的水沟，跟着这位女士去了礼拜堂。聚会结束后，他们到她家喝茶；就在那天晚上，开始了后来为水手举行的主日晚间聚会，使她赢得了全世界的水手之爱与尊敬，被称为"水手之友"（The Sailors' Friend）。

每主日有四十至八十名水手和其他人聚集在她的客厅里，多年来，这些聚会是上海举行过的聚会中最有果效、也最引人入胜的。聚会主持得极好：简短热切的祷告、恳切的信息、明亮的歌唱，使聚会极具吸引力；而她对灵魂归主的信心，使她的教导与呼召格外直接。军舰上的水手和其他水手的普遍品行所发生的改变，令人惊叹。在中国的其他口岸，乃至日本，对水手的同样关怀也兴起了，她"求神赐我工作"的祷告得了完全的应允。

这位可亲的女士如此热切地关心水手的福祉，水手们对她回报以爱与尊敬，感激她使他们远离试探的努力，这毫不奇怪；当他们从黑暗中被带入光明与生命，继续仰望她得指导与帮助，这也不足为奇。

其中一位亲爱的船员这样写信给她：

"最亲爱的母亲，抽烟有什么不对吗？昨晚Frolic号上一个年轻船员看见我抽烟，对我说，我还没有为耶稣舍弃一切，所以我想问问您，您觉得这有错吗？若有错，我就戒掉。凡我救主所不喜悦的，我一概不作；凡您所不喜悦的，我也不作。若我明知会惹您不快，我绝不去作——您已应许作我的母亲。您不知道我多么爱您，如同爱母亲，如今比与

您在一起时更甚。您待我比任何人待我都好。若不是认识了您，我就不会认识耶稣。"

水手们就是这样写信给他们的属灵导师的，这证明她已完全赢得了这些诚实、直率、单纯之人的心。

这样一位工人，自然是驻扎汉口的宣教士们乐于接纳的同工。在汉口，她的精力更多投向中国妇女和女孩子，尽管她对水手的爱终其一生未曾改变。每当有炮舰或茶船到访本埠，她总是不辞劳苦地服事船员们属灵的需要。

她在属灵上的扶助与同情，使她的丈夫大得振奋，他在布道站的各项事工上比以往更加奋力。杨夫人抵达汉口时，布道站已近两年没有英国女士，女信徒人数的增长，远不及中国男信徒的增长比例。杨夫人的到来，是更美好事物的开端。她着手学习汉口方言（与上海方言不同），不久便与一位读经妇逐家探访，督导一所女校，尤其专心教导医院里的女病人。无论风雨晴日，人们天天看见她走在去医院的路上。有一次，烈日当空，她从医生家门前经过，医生对一位同僚说："这在印度是我从未见过的。杨夫人对这些可怜妇女的爱心，真是奇妙！"她深知她们的灵魂何等黑暗忧伤，觉得必须去把光明和安慰带给她们。她在这一方向上的劳苦没有

徒然。一些最令人满意的女信徒，正是藉她在医院中的工作归向基督的。

杨夫人常陪丈夫到汉口周围的乡村去。她特别喜爱老年妇女；看她牵着一位满脸皱纹、形容枯槁的老妇人的手，告诉她自己多么爱她，再设法向她黑暗的心灵传达一位天上的主比她更爱她，这是何等动人。"来，格里菲斯（Griffith），"她常这样说，"来给这位可怜的妇人讲讲耶稣和祂的爱。"

一八七五年至七六年的冬季，麦肯齐医生（Dr. Mackenzie）陪同杨先生作了七次到附近乡村的短程布道。他们力图把传讲福音与医治病人结合起来；在这些路程中，几乎走遍了附近所有村庄，许多是第一次去。

新年伊始，医院因故必须关闭，这两位弟兄便作了更远的路程，前往距汉口约四十英里的孝感（Hiau-kan）陶瓷产区。在这里，他们遭遇了比杨先生以往经历过的任何一次都更粗暴的对待。神怜悯地为祂仆人在向民众说话时每日面临的许多危险拉上帷幕。然而在孝感，他们遭到一群异教徒的猛烈围攻，各样投掷物向他们飞来。宣教士们屡次被沉重的土块和石头击中。约有五分钟之久，杨先生似乎命在旦夕。从汉口陪他们同去的基督徒信徒勇敢地站在他们的牧师和医

生前面，尽力为他们挡住击打。其中一些可怜的弟兄被打得很惨。若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他们基督徒品行的真诚，这时已确凿无疑地显明了——他们在血中为基督作了见证。

杨先生说："我一生从未像在那场风暴中那样平静，死亡的前景丝毫没有搅扰我的平安。我感谢神，竟蒙允许为基督的缘故流血。我在中国劳苦多年，却从未蒙召为祂流一滴血。这思想给我的灵魂带来真实的甘甜。"

于是，在痛苦与争战之中，神赐平安给祂的百姓；若在传福音以外的境况下本是灾难的事，藉着祂的大能，反成了安慰与恩典的季节。

不久之后，杨先生重访该地区，发现一切平静。他到处自由讲道，受到热诚接待。在一些村庄，人们为他搭起讲台，数百人从远近而来，要听他讲论那些基督徒甘愿为之受苦的事。野蛮的攻击与所显出的忍耐，不仅为"耶稣教"作了宣传，也在原本冷漠的异教徒心中激起了人性的同情。美好的工作在那里开始了，光明的远景使杨先生满怀盼望与喜乐。他得胜的果子中，最不小的一件，便是在这些曾要取他性命的人中间开设了一间礼拜堂。

一八七五年茶叶季节期间，杨先生夫妇每晚向船上的水手开放住宅，举行了许多饶有兴味的聚会。杨夫人负责聚会中的音乐部分，讲道也很有果效。有十起明确归主的例子，两人都为努力所结的其他美果大得振奋。

杨先生写道："从一条船走到另一条船，从一个水手走到另一个水手，问'船上有基督徒吗？你是基督徒吗？'，得到的回答除了'没有'还是'没有'，真是令人难过。这些船上的光景就是这样，尽管它们来自基督教的英国。"

许多水手无疑乐于在靠港的夜晚有一个基督徒的家可以去，那里有美好的歌唱、活泼的音乐和引人入胜的交谈。这里还有一个汉口引以为荣的花园。杨夫人初到时，布道所门前还是一片荒野；她喜爱花卉，每天从城里回来，便花一两个小时在这块地上劳作。不久大变样了：美丽的植物、开花的灌木、各样能买到的花卉都种上了。丈夫当时写道："这是汉口最漂亮的花园。这些清晨，花园沐浴在露珠中，每一滴露珠都胜过戈尔孔达（Golconda）的宝石，美极了。我们门前有一株大丽花，开了七十朵大红花。"

各礼拜堂的工作不断传来成功的消息。一八七六年受洗的超过一百二十人，比以往任何一年的增长多出一倍以上；

一八七七年又有许多人寻求加入教会，仅头两个月就有二十六人受洗。

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杨先生对自己深感不满，也觉得布道站应当迈出更大的步伐。他写道："我的心正以强烈的渴慕转向神。请读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至二十节，你就知道我在为什么祷告——'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渴望被神圣的知识、神圣的智慧、神圣的爱、神圣的圣洁充满，达到我容量的极限。我愿感到'我灵魂的众流都交汇于一道深而阔的河渠，一齐流向基督的心'。我对基督里为我们存留的宝藏，才刚刚开始认识。在我看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更属灵，也应当比现在有力得多，难以言喻。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是一切；天父乐意把圣灵赐给最软弱的人，只要他以全然的信心和完全的降服来求。这些日子我的呼求是：求五旬节先临到我和我的宣教士弟兄们，再临到本地教会，再临到广大的异教徒。没有这个，我们什么都不能作。我写信时何等渴慕！你们的神近来以一种方式向我显现，我为此赞美祂的名。大滴的祝福已降入我的灵魂。但我仍在等候大片乌云融化为丰盛的夏雨。"

长久仰望的祝福来了，带着丰盛与大能，毫无疑问出于神圣的源头。杨先生整日俯伏在神面前，摔跤祷告，等候得

着能力。第二天他出去讲道，却没有预备经文。神开了他的口；他讲的时候，圣灵真实的洗临到他和信徒身上。他们被喜乐充满，四面八方信主的人都起来见证神的爱；许多在基督耶稣里还是婴孩的，成了大人，放胆向未信的中国人讲论基督。一些品行最恶劣的人改变了，走遍乡间；不久，远方的陌生人纷纷涌来，按他们的话说，是来听福音，因为他们已经在信徒的生活中看见了福音。

美好的工作就这样惊人地扩展开来。杨先生自己的见证是：自从他蒙神特别赐下"从上头来的能力"（Power from on High）那时起，他作为宣教士才真正开始大有果效。毫无疑问，往年所作成的善工也是出于神；它经得起考验，其中一些人如今已是得荣耀的圣徒；但他的这番话，必须视为一位自觉受基督之灵教导之人的肺腑之言。

一八七八年五月初，杨先生为一个姊妹差会执行一项任务，恰合他开拓的性情，令他十分愉快。苏格兰国教会（Established Church of Scotland）差派了一个布道团，要驻扎在溯江而上近四百英里的宜昌（I-Chang）。伦敦会总部请杨先生尽力给予一切协助。他陪同年轻的弟兄们前往他们的工场，住下直到他们安顿妥当。一切顺利，他回到汉口，觉得自己最乐观的期望都已实现。

一八八〇年，中国谣言四起，传说将有战争；虽然俄国是直接关注的对象，但本地人中普遍有一种看法：若战胜俄国，就意味着要逼迫基督徒。这种情绪妨碍了汉口布道站工作的进展，慕道者受到惊吓，加入教会的人数减少。尽管如此，仍有五十八位成人和二十九名孩童受洗，发展的迹象十分明显。

孝感地区的信徒想建一间礼拜堂，但被告知差会不能为他们提供。杨先生却应许：若他们肯出地，并按力量为建造捐献，他就设法在汉口为他们筹款。两块地立刻就有了，汉口的本地教会听了这主意十分欢喜。有的捐得多，最穷的也捐了一点，宣教士们也认捐。结果建起了两间小礼拜堂，每间附一间先知小屋（prophet's room），信徒们还白白出了许多劳力。当时由信徒全额建造礼拜堂是独一无二的事，因为中国人本质上爱钱，他们的心若不是被触动，断不会这样作。杨先生看见他们拿着一串串铜钱来，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所经历的改变在他看来是何等巨大。其他差会的宣教士怀疑此事的真实性，一位弟兄很自然地说：中国人应许是一回事，给钱是另一回事。但应许确是出于诚意，几乎全部款项都交到了执事手里。福音的大能在此显明：四年前还是异教徒、用石头打宣教士的同一批人，如今竟以能为耶稣教建造礼拜堂为荣。

汉口一位名叫王建堂（Wang Kien-tang）的信徒开办了一间纯粹华人医院，使杨先生大得振奋。王建堂曾受教于里德医生（Dr. Reid）、希勒医生（Dr. Shearer）和麦肯齐医生。地皮和房屋都是本地官绅、商人和信徒捐的。这间医院靠病人的诊费自养；王医生白白服务，靠医院以外的行医收入维持生计。这机构最可贵之处是：王医生告诉捐款人，他是基督徒，除非获准以基督徒的身份作工，他不能承担医疗职责。众人答应了；一八七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医院以基督教崇拜仪式开幕，此后每天在那里讲道。

这一年，杨先生与苏格兰圣经公会（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的阿奇博尔德先生（Mr. Archibald）作了一次长途旅行，行程一千二百余英里，遍及湖南（Hu-nan）、江西（Kiang-si）两省。这两省的省会一直顽固地拒绝外国宣教士进入。一八八〇年一月四日，这两位先生在后一省会城门外被挡回。当天下午，他们与两位官长长谈，官长似乎全无放行的意思；但他们设法说服了官长，获准次日进城。他们进去了，向各处游览，遍览名胜，在庙宇和街上讲道，把能匀出的书都卖了。同年许多宣教士听闻他们的成功，纷纷前往南昌，城内作了许多传福音的工作，充分证明著名的南昌（Nan-Chang）——江西省会——确在他们到访之际开了门。

他们取道湖南返回，试图进入全省最大的商埠湘潭（Siang-tau），却被驱逐。他们叩湖南省会长沙（Chang-sha）之门，门却关着。他们与长沙的官长作了一次极为融洽的长谈，相信官长若能放行是愿意的。官长直言他们惧怕百姓，不敢放入宣教士。在其他城市，宣教士们发现大而有效的门开了，便满怀盼望回到汉口：愿长沙百姓早日放下骄傲与敌意，使中国最后一个省会向福音敞开城门。

必须一提：这次旅程中他们还访问了景德镇（King-teh），其名声比南昌、长沙更广。这座巨大的商埠是全国最大的商埠之一，以瓷器制造闻名于世。从未有宣教工作在此尝试过，杨先生深疑这样戒备森严的地方会容许任何外国人进入其境内。然而他们大获成功：登陆时无人阻拦，穿行于狭窄的街道，参观窑炉，察看……

……也把瓷器的每一道制造工序都看了个遍。他们也向蜂拥而来的人群讲道，售出数以千计的书籍和小册子。杨格非永远忘不了在该城中心的那次聚会——那是他在华所面对的最大一群听众。两位宣教士来到御窑前的一大片广场上。一时间，全城人似乎都涌进了这片广场。他们站在那里数小时之久，竭尽全力讲道，书籍递出的速度快得双手几乎供不上急切的购买者。在那里从未见过外国人的面孔，人们的好

奇心极其强烈，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工作结束后，他们启程离去，对官吏们的态度深感满意，更为上帝赐给他们的一切成就满怀感恩。他们看这些城市的成功全是上帝的作为，便将一切荣耀归给祂。

一八八〇年，杨夫人偕姐姐离开汉口回英格兰。杨格非在给挚友雅各布先生（Mr. Jacob）的一封信中，简要说明了她回国的原因："杨夫人来华已有二十六年；过去十六年中，她唯一的休息，只是九年前的六个月短假。结果是她的健康两三年前就开始走下坡路，约四个月前她又严重扭伤脚踝，自此一直卧床，这更使健康加速衰退。这对她是一场很大的试炼——她素来勤勉，日常生活中总是工作排得满满当当。在中国很少有宣教士比她更操劳，也很少有人在工作中得着更多安慰。

"'我觉得，若只顾自己的幸福，把她留在这里再熬过一个夏天，是不正当的。对我们两个都是极大的试炼，但人生本就由试炼组成。你若问，"你为什么不同她一起回来？"我的回答很简单：我的同事离去后，差会目前全然落在我一人肩上。我不能走。'"

朋友们的恳求徒然无果，而一通不可抗拒的电报却把他召回。杨夫人的健康起初确有好转，但她随后去了美国。在

那里发现有其他症状出现，杨格非便接到发往纽约的电报，被召前去。一八八一年三月他抵达纽约，见她容貌大变，大为震惊，对她忍受的剧痛深感难过。四月初她成功接受了一次手术，大大缓解了痛苦，之后她恢复到足以返回英格兰的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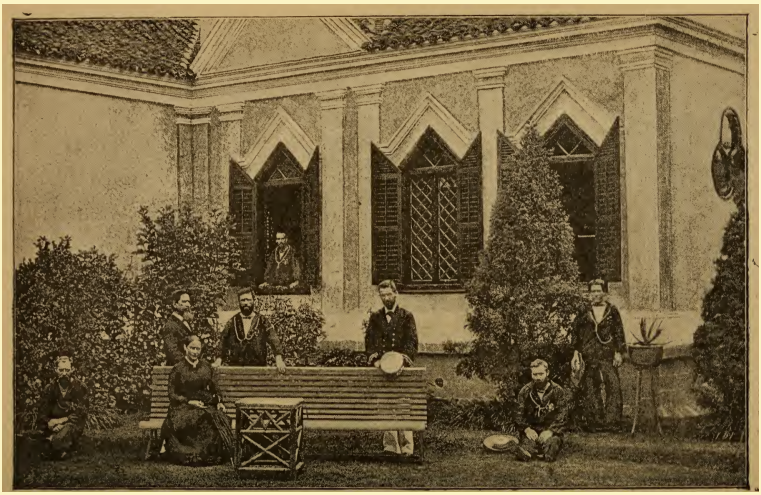
在纽约，杨格非受到比文牧师（Rev. Dr. Bevan）牧师的热情接待；比文牧师与其他朋友争相尽其所能，在他极度焦虑的日子里给予一切基督徒的帮助与同情；许多基督徒姊妹也同样扶助他受苦的妻子。

杨格非夫妇于一八八一年七月回到英格兰，在朋友中度过了一个冬天。他再次受邀为中国的事业呼吁；在公理会联合会的秋季大会和许多教会中，他以扣人心弦的雄辩发表讲演。

然而夫妇二人都渴望重返所爱的工作，于一八八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离开英格兰。杨夫人在华的停留却极为短暂，病情复发，迫使她在一八八二年七月返回纽约接受进一步的手术治疗。手术成功，她再次尝试重拾所深爱的工作，于一八八三年十月抵达汉口。

在英格兰时，杨夫人曾从朋友处收到多笔款项，专为她长久怀有的一个计划：建造一座水手休憩所。这座小楼建在

杨格非花园的东南角，从书中插图可见，是一座颇为雅致的建筑。在这里，善工热忱地开展，社区的欧洲人也常在此聚会。喝茶季节期间，许多水手悔改信主，几艘英国炮舰的全体船员也在这幽静之所得着极大的造就。



图十：汉口水手休憩所

杨格非向来努力使自己的工作适应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最欢欣盼望的事之一，就是能在亲人怀抱中辞旧迎新。岁末将尽的那些日子里，数以千计的人离城回乡，至少十五天之内，按规矩不能做工。人们把时间都花在访友、宴饮和游乐上。因此杨格非选择新年期间走访乡间布道站，因为男人

们都在家，可以全身心听他的教导。他的计划是：白天向未信者讲道谈道，晚上与归信者一同祷告、讲解圣经。

一八八五年二月十七日——中国新年正月初三——他离开汉口，同行的有吉利森医生（Dr. Gillison）、斯帕汉姆牧师（Rev. C. G. Sparham）、一位本土助手和一位执事。离汉口约十英里，他们来到一条通往孝感（Hiau-kan）的河。河上的船只都张灯结彩，船夫们懒洋洋地闲逛，全无做工的心思。但在中国的现金是无可抗拒的力量——只要酬劳配得上时令，还是找得到愿意开船的人。他们连夜行船，清晨早早在魏村（Wei village）登陆，步行十二英里穿过田野，欣然之至。魏村的小礼拜堂老远就望见了。他们到了之后，会众已聚集；他们日复一日地讲道，听众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吉利森医生则在圣器室里为成群的病人看病。

主日是个大日子：数人受洗，约一百人同领圣餐。杨格非不由想起当年与麦肯齐医生初次试图进入这个村子时，如何遭到暴民无情的攻击，被赶回汉口；也记得他第二次来访时，站在如今礼拜堂所在之地，对当时为数寥寥的归信者说，他确信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将成为这一带第一座圣所的所在。

其他村子以及孝感城的情形，进展却不那么顺利。在林村（Lin　village），未信者态度冷漠，敬而远之。有两名基督徒病了，他们前去探望并一同祷告，然后分手。当晚一名信使追到孝感城，恳请他们回去：因为一名基督徒去世了，未信的一派正就其安葬的方式、时间和地点闹得不可开交。

次日清晨，杨格非与斯帕汉姆牧师返回，努力向未信者说明，他们干涉基督徒这类事务是多么不讲理，并反问：如果基督徒也插手规定未信者该如何安葬死者，他们会怎么想。未信者提议尸体停放一百天再葬——被当作不合理拒绝了。他们又提议棺材放在地上、一百八十天不下葬。他们又提议：若杨格非能担保那村子一百天内无人死亡，就准许老人下葬。对方被告知：他是人，不是上帝；并且若不准许安葬，此事将交由官府裁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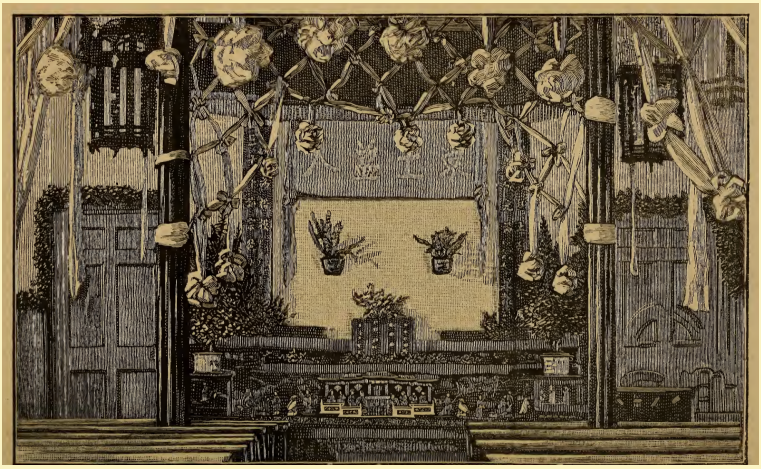
这时一位老者上前，请求另选一块地，因为选定的那块地在风水上会妨碍邻家的坟。杨格非说他们不信风水，一块地与另一块地并无分别；只要亲属不反对，他个人愿迁就他们的意愿。征得寡妇同意后，就在附近选了一块地，在众多未信的围观者面前，将这位老基督徒体面地安葬了。杨格非盼望他这温和的态度能把未信者引向宣教士；他乐于表明，自己坚守信念，同时无意蔑视他们的顾虑，无论在他们看来

多么愚不可及。因此，临行时听见有人说："那位洋教师是个好人。"他格外欣慰。

回汉口途中，他们到蔡甸（Tsai-tien）停留，发现一名基督徒被一伙暴徒殴打，带头的是一个和尚，原因是他不肯为未信者的庙会捐款。多年来，这一带的基督徒常为同样的事受未信者搅扰；如今因中国在中法战争中获胜，未信者胆气壮了，深信驱逐洋人、将耶稣的宗教逐出这片土地的日子已到。此事呈到官府，官府颁布了一道令人满意的告示，提醒百姓基督徒归信者享有条约规定的权利，末了郑重警告：若再发生此类暴行，必将依法严惩肇事者。

中国人的性情向来沉静，谈起任何话题都很少流露激动。然而一八八五年十月初发生了一件喜事，打破了惯常的平静，汉口的归信者表现出在中国罕见的热情。此事就是为杨格非牧师抵华三十周年举行的庆典；本土弟兄们所流露的感情，让所有宣教士都颇感意外。

那天约三百人聚集在医院礼拜堂——归信者已按中国风格把礼堂装饰得十分雅致，书中插图可见一斑——向杨格非敬献三块精美的匾额，匾上记录着中国弟兄们对他的敬爱之情。中央最重要的一块匾，绿绸底上四个烫金大字，内行人一看便知：中国弟兄们视杨格非为"东方恩人"。



图十一：为杨格非感恩礼拜装饰的医院礼拜堂

墙上精美的匾额（插图中可见），以及五彩缤纷的装饰——品味端正、富丽堂皇——固然诉说着无数爱心与巧手，但典礼最动人的一幕，是归信者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争先恐后地见证上帝的美善：祂把他们所爱的牧者带到他们中间，又保守他多年来在汉口健康有力地劳苦。苏格兰圣经公会的阿奇博尔德先生也优雅地向沈先生致意——沈先生二十八年来忠心协助杨格非，是一位可敬的老者。

杨格非作了答谢，提到他早年对马达加斯加的热爱如何被上帝改变方向，上帝又为他开了一条来中国的路；之后数名成人与孩童受洗，约二百五十名基督徒一同领受圣餐。这场景与二十四年前大不相同：那时只有两三位初醒的基督

徒，在杨格非的民宅中胆怯地与他一同行这爱与事奉的圣礼。众人又怀念那些早已加入得胜教会的故友，第一场在华中举行的感恩礼拜就此结束。

此时他们在汉口的主要聚会场所——街口礼拜堂（Kia Kiai Chapel）——正在重建。那是华中第一座礼拜堂，已是旧堂。二十多年来，福音在其中每天宣讲数小时；辽阔帝国各省都有人在那里初闻真道。那里撒下的种子，如今已在汉口及周边结出许多其他礼拜堂。杨格非祷告说："愿这后来的殿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们相信必是如此。

汉口差会的成功就这样不断扩大，使杨格非的心欢喜。然而在这一切之中，一八八五年尚未结束，他便遭受沉重打击：他心爱的妻子离世，进入永恒的奖赏。

杨夫人的去世，是她一生的和谐收束。约三个月前她开始觉得身体不适，但直到一八八五年圣诞节，夫妇二人都未觉察危险；那天她多次严重发冷，午后剧痛，随即出现吉利森医生诊断为腹膜炎的症状。爱与医术所能给予的一切帮助都尽了，但她渐渐恶化。丈夫和朋友们抱希望到最后一刻；然而离世前两小时，她起了大变化，他们的心开始下沉。在那两小时里，她以最清晰的方式表达了信心与盼望。她似乎看见了荣美之王的临在，天上的幔子向这位涉水过河的得赎

者揭开。这是一次凯旋的渡越。身体虚弱使她言语不清，但她不断重复奇妙的话语，如："耶稣！宝贵！耶稣，救主！来吧！主耶稣！福乐！格里菲斯！不要难过，格里菲斯！"

丈夫问她是否喜乐。刹那间，一道奇异的光照在她脸上——或从她脸上发出；她睁开眼睛，定睛望天，说："耶稣，主！何等美丽！"最后半小时里这句话反复出现，她唇边带着这句话咽了最后一口气。

在场的人永不能忘记那半小时所见所闻。他们觉得天就在他们中间，他们靠近了君王。"那是什么光？不正是另一张脸的反照吗——那张脸正向她微笑？灵魂飞去了，但脸上留着回应的微笑，美得让凝视的人难以相信：那被异象点亮的灵魂，难道不是还在后面，使这微笑发光吗？"

灵魂依然向上，奋力高飞，
展光之翼；
那将属于你！
你已一切安好；
惟愿我也能如此！

忠于亡妻意愿的丈夫（他深信这正是她生前会表达的愿望），把她的遗体顺扬子江而下，乘江宽号轮船（ss. Kiang Kivan），安葬在上海美丽的墓园。他女儿——一直是他的安

慰与帮助——陪他走完了这段悲伤的旅程。当他们漂过美丽的峡谷，经过银岛、金岛，驶向她在东方最爱的那片土地时，"天朝"的景色从未像此刻这样震撼这些哀悼者的心。



第九章　疲乏却仍追赶——中国向福音大大敞开——安然去世

祢的能力如此长久地眷佑我，我深信祢仍将引我前行，\
越过丘陵山谷，渡过溪流急湍，直到黑夜退去；\
当清晨来临，那些天使般的面容向我微笑——\
我久已深爱、却暂失的面容。

杨格非先生（Mr. John）在1886年的生活经历，以软弱与忧伤为主要特征。然而，美轮美奂的新礼拜堂之落成与启用，给他带来一份满足与喜乐：礼拜堂配有宽敞的议事厅（亦作客厅）、本土传道人住宅、女校及教师宿舍，再加上一间书店，数栋建筑皆建于同一块大地皮之上。

如同水手馆（Sailors' Best）一样，这一切都是1881年杨夫人（Mrs. John）那次痛苦之旅的果子——那一年她前往纽约与英格兰，杨格非先生被急召前往相伴。虽然他们心里惋惜，那段时间似乎从汉口（Hankow）宣教工作中夺去了宝贵的光阴，但如今证明，那段忧患的时光反为那工作带来了满满的祝福。

杨格非先生偕夫人旅居英格兰期间，作为差会的代表奔波劳顿、行程繁多，但仍未忘记在汉口主要华人街上建造新礼拜堂的需要。起初募集到的捐款远远不够所需。就在最后一刻、当这项事业似乎注定要失败之际，几位朋友在一次送别聚会中默默凑足了余款，使先前所定的数目得以完成。然而因地价大涨，这笔钱仍显不足；又有别的朋友出手相助，所需款项——约一千英镑——终于筹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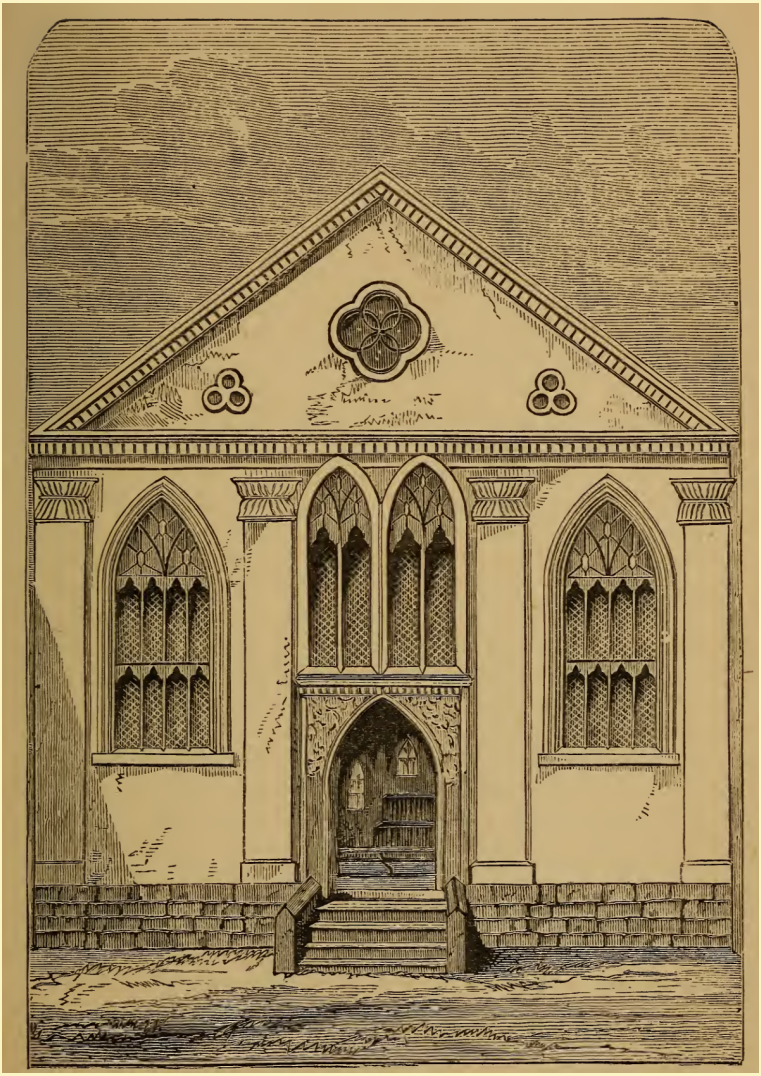
六月二十七日（星期日）清晨，约三百名基督徒首次聚集在这座新礼拜堂里。他们从未有幸在这样的地方敬拜神：拱形装饰的屋顶、线条优美的尖拱窗镶着菱形彩色玻璃、精雕细刻的讲坛，以及专门为迎合中国人审美而设计的整体外观，都给归信者留下极为悦人的印象。后来有些人说，在那几次开幕聚会中，神在他们心中变得更高、更伟大、更配受赞美。

下午，四百五十名基督徒参加聚会，卫斯理公会汉口区议会主席（Wesleyan Hankow District Committee）希尔牧师以创世记二十八章十七节为题讲道：「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

随后还有多场聚会，人们越发熟悉这座美丽的属灵家园，喜乐也日渐增长。兹将这座华中地区最大、最美丽的新教教堂的细节略述如下。

从大街进入宣教地产，须经过一座高大庄严的中式门楼，门楼左侧是一间书店，守堂人在此出售圣经与小册子。进门是一个方形的石板庭院，正对面便是礼拜堂，其正面外观见附图。大门上方的双联中央彩窗，是为纪念「威斯敏斯特礼拜堂（Westminster Chapel）」的朋友们而献——他们捐助了相当大一部分款项。后方一扇同样色彩的窗子，使归信者想起已故的杨夫人：她如同大卫一样，未能亲眼得见自己长久为之祷告、为之劳苦的神的殿宇落成。另一扇窗子是为纪念已故的约翰·肯普·韦尔奇先生（John Kemp Welch）。讲坛本身堪称艺术品，是利物浦的托马斯医生（Dr. Thomas）与其会众的爱心奉献。礼拜堂后面还有一个庭院，摆满了花木盆栽；再往里是一间宽敞的议事厅（兼作客厅），按地道的中式风格布置。这栋建筑的后面，是一座

坚固的六间房宅院，住着忠厚年老的曾执事（Tseng）夫妇；在中国人中，他们以整洁和好品味著称。曾执事住宅后面是一个小方形花园，花园对面是阿诺德·福斯特夫人（Mrs. Arnold Foster）的女校及教师宿舍。这处宏伟的地产采用中式建造，既省钱，又更合实用。人人都能感受到：从1881年那次黑暗忧伤的休假中，如今照出一道大光，为汉口宣教工场的工人们增添了许多亟需的便利设施。



图十二：汉口新礼拜堂正面

这一年将因总理衙门（Tsung-li Yamen）自北京发出的著名告示而永远被铭记。读者将看到，这份告示的通篇语气与1844年的谕旨截然不同——当年那道谕旨曾使所有关心中国福音化的人心生感恩。它不仅声明信奉基督教本身并非罪行，还告诫民众要与基督徒邻舍和睦友好相处，并劝勉各地官吏对前来求告的基督徒一律秉公处理。以下告示由浙江省巡抚颁布：

「今年三月（1886年4月）奉到总理衙门谕旨，大意如下：

『保护基督教信徒之条约既已载明，中法两国今已重修旧好，应将光绪十年七月（1884年8月）奉颁谕旨重行宣示：凡有教堂之处，皆应出示晓谕，以期民教相安。』臣当时已遵饬办理，然辗转经手多人，难免迟延舛错，或有未遍颁行者。为仰体朝廷仁爱之至意起见，不得不明白开导。着晓谕各色人等知悉：设立教堂之宗旨，惟在劝人为善；入教者仍是中国子民，彼此仍须和睦相处，勿因猜忌致生事端。嗣后凡涉讼到官，地方官须秉公审断，唯视案情曲直，不问教民与否，并迅速结案。如此则两造均不受害，各安其业，而朝廷一视同仁、华洋一体、仁爱远人之至意，庶不致落空。自此告

示颁布之日起，凡无赖匪徒无故生事滋扰者，定按律从严惩办，决不宽贷。切记！」

除了上述告示所未提及的一点，今之官府宣言与1844年谕旨之间还有一大显著差异。上海张贴的告示中有以下数语：「须知传教士居住尔等乡村之中，尔与彼互为主客。……尔等首要之责，是以礼貌宽容待之。」这其中预设的情形，与前谕颁布之时何等不同！那时传教士只能局限于五个通商口岸；如今，连帝国的乡野村镇都向他敞开。八十年，在个人的一生中是漫长的岁月，在一国的历史中却是短暂的一瞬。比较1886年的告示与1805年的谕旨之后，谁还能说基督教在中国毫无进展？其进步之大，令人惊叹。神已藉着祂至高的权柄统管过去八十年的政治风云，使中国皇帝的宗教政策发生了几乎彻底的转变，举世共睹。与此同时，藉着世人鲜少察觉的属灵力量，中国百姓在宗教上的思想情感也正在悄然经历更大的变化。

1887年最令人感兴趣的事件之一，是汉阳新礼拜堂的启用。那里的一些归信者是杨格非先生所见过最出色、最优秀的，他们不知疲倦地出席汉口礼拜堂的聚会并从旁协助。尽管住在六七英里之外，风雨冰雪都不能阻拦他们参加主日聚会。这些贫苦的人买了地皮，汉口和武昌的基督徒弟兄又为

建堂筹得一笔可观的款项。开幕那天的喜乐令人久久难忘。人人满心欢喜，讲论滔滔，几位归信者受洗，三城的教会都大受激励。

一位湖南人的归信值得一记。一日他来到礼拜堂，杨格非先生讲道之后，按教理问答会众。他对答如流，于是有人问他从何处得知这些道理。他说自己读过几本书。众人便恳切劝他将心交给神。他应允了，成为一名热心的基督徒。然而逼迫的烈火在等着他：他的同业者因他的信仰想要将他开除，但他年迈母亲的恳求起了作用。她说：「你们为何要夺走我唯一的儿子？你们也知道，他是最好的儿子之一。你们能挑出的他唯一的错，就是他是基督徒。看在我的份上，饶了他吧。」他蒙神恩慈保守，在知识上日渐长进。

1887年去世的几位年迈会友中，有可敬的沈子星（Shen-tsi-sing）——杨格非先生三十年的忠实朋友、助手与传道人。他曾担任杨格非先生的文士，协助撰写或翻译他除一本之外的所有书籍与小册子，并从汉口宣教工作创立之初就与他同工。这位非凡人物前文已有记述，此处只需补记：数年前他患中风偏瘫，晚近愈发衰弱。1887年初，他返回故乡南京。杨格非先生派人护送，照料他的一切需要。那人回来禀报：沈先生已于十一月七日去世。

杨格非先生这样评价沈先生：「我爱他、敬重他、信任他，超过我曾对任何其他中国人。他的学问、才干和品格，人人敬重。他全心全意地信靠耶稣；多年来，他最喜乐的事，就是站在礼拜堂里、街头上、庙宇中，传讲基督并祂钉十字架。我从未见他在传讲或谈论基督时露出丝毫惧怕或羞耻。愿神在这片土地的众教会中，兴起更多像沈先生这样的人。」

另一位亲爱的弟兄是冯先生（Mr. Fung），他曾吸食鸦片。杨格非先生以雅各书四章八节为题的一篇讲道，使他戒除了这恶习。杨格非先生描绘吸鸦片者举起沾污的双手祷告，神却吩咐他去把手洗净。冯先生向基督徒弟兄们讲述此事时说：「当牧师扮演吸鸦片者，举起双手，讲到神正注视着手指上的鸦片烟渍时，我觉得他正是在描述我；当牧师喊出『有罪的人哪，要洁净你们的手』时，我觉得是神在对我说话。我决心戒除这恶习；我要告诉你们大家，我宁死也不再碰那可咒诅的东西。」冯先生在主里去世，临终的日子里，人们常听见他反复念着：「离世归父。何等美好！」

最令人振奋的消息来自孝感（Hiau-kan）地区的教会。那些健壮的村民，当年曾图谋取杨格非先生和麦肯齐医生的性命，如今同样热切地传扬他们在耶稣里的信仰。那里的教

会又添了新的归信者。一位候洗者在受洗前数月病危。土法医治无效后，有人劝他打消加入基督教会之念，请佛像来拜。他说：「不。基督既肯为我舍命，若祂要取去我这微不足道的一点生命，我若舍不得，岂不奇怪？」他病得痊愈，欢欢喜喜地被迎入教会。

基督徒不仅要哀悼自己所爱的亲人离世，还与未信主的邻舍一同经历了严重的患难——中国人因此称1887年为「七大灾之年」：大雪、大雨、大水、大疫、大火、大旱，以及黄河决口之大灾。

神就这样藉着祂的护理、所传讲的道、为祂作见证的子民，以及由此发出的愈发明亮的光，教导中国人：祂的国度已在他们中间建立。

1888年，汉口宣教工作每月都有可观的新人加入，令人鼓舞。杨格非先生仍在埋头从事将旧约翻译成「浅文理」的巨著，但这并未妨碍他分担全部的日常工作。中国人看见他走进礼拜堂，仍会对比他正在讲道的本土传道人说：「下来吧，让这位洋人给我们讲；我们听他讲比听你讲更明白。」他的心系于这三座大城——两百万居民的宣教事业，他的目光却投向更远的地方。他仍在思念重庆（Chung-Kiang）——二十年前，他是第一个在那里扬声传福音的人。为那重

要之地预备的宣教士仍在汉口劳作，等候弟兄们看出时机已到，便前往那里从事开创宣教工作的指定使命。

华中圣书公会（Central China Tract and Book Depot）——杨格非先生任会长——已发行各类出版物五十余万册，但他仍在重复他那句老呼吁：「传道！传道！」而且大有理由。

几年前，宣教士所到之处，乡民都喊「书！书！」如今宣教士再去，呼声变成了「讲道！讲道！」他们已经读过书，现在要人讲解。讲道对人心仍有一种奇特的吸引力。杨格非先生说：「给他们一本书，他们或许会仔细读，却似乎无动于衷。我从未见过一个中国人读着书流泪，但我多次因传讲福音而使中国人流泪。」

宣教士们越来越重视青少年的培养。他们现在有六所男校、两所女校，首要目标是使孩子们认识那在耶稣里的真理。不久前，一个申请入会的小瞎子接受考核，杨格非先生问他：「你知道耶稣在哪里吗？」「祂在这里，」孩子回答。「你是瞎子，怎么知道耶稣在这里呢？」牧师问。「因为我用心眼能看见祂。」

如此，老少都被这位慈爱而有智慧的汉口宣教工作创始人，领入义路。

神继续以丰盛的果效尊荣他；1888年5月，他在英格兰的弟兄们推选他为1889年度英格兰和威尔士公理会联会（Congregational Union of England and Wales）主席，以表彰他忠心的劳苦。但愿前路为他开明，使他能接受此职，因为他的亲临与为宣教事业的倡导，必能引起关注，为他长久心系的工作带来许多帮助。

有些基督徒对待刚刚脱离异教的弟兄的态度，似乎可用这两句诗来表达：

来世，在比今世更美好的世界里，\
我愿对你有更多的爱与了解。

然而，若杨格非先生能回应英格兰众教会的呼召，他担任这一重要职务，将使许多支持伦敦会的人前所未有地体会到：本土的神的工作与这些「众教会的使者」在海外所作的工，如今是何等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自杨格非牧师（Rev. Griffith John）回应主的呼召、前往中国，已过去三十三年。我们不能不赞叹敬拜那预备、并在恰当时机差遣如此奇妙适合这艰难工场的工人的智慧与全知。磐石虽被神击打，依然是磐石；从它石质的怀中所引出的活水，需要熟练的手来引导它穿过沙漠。二十五年前，他独自站在汉口，面对难题；如今，一群勇敢勤劳的宣教士站

在他身旁，在与邪恶的争战正酣之际，以慈爱的同情扶持他的手。已占领了如此多的要地，稳步的进展不断被记录下来，争战的最终结局已毫无悬念。

试图对杨格非先生作出评价，是不合宜的。这样的评价，只能由那位「必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的主来作出。我们宁愿祈求：愿他长久蒙保守，得以将迷途的外邦人引向永生神的道路，然后在凯旋的欢呼中进入君王的面前。

宇宙之神啊，求祢垂听我！永恒之爱的源头，\
倾听祢仆人的声音！我向祢的天发出祷告。\
愿我在来世祢的宝座前，不失去祢在此赐给我的这些灵魂中的任何一个！\
我爱他们众人，如同父亲；\
愿他们为我作证：我曾教导他们救恩之道，\
按我所知祢的话语，忠心到底；愿他们再次认得我。\
愿他们伏在老师的胸前；愿我把他们安置在祢面前，\
如今纯洁，将来虽经更多试炼仍纯洁，并同声欢呼：\
「父啊，看哪，我在这里，与祢所给我的儿女同在。」

全书完。

术语表

中文	英文原名
白顶官员	white-button rank
布雷肯学院	Brecon
长毛	long-haired rebel
从上头来的能力	Power from on High
德慧之门	"The Gate of Virtue and Wisdom"
法国皇后号	ss. Imperatrice
发烧并发疟疾	fever and ague
佛	Fu, Buddha
福音大纲	"The Great Themes of the Gospel"
官话	Mandarin
观音	Quaning
观音教	Kwan-yin
贵格会大炮	Quaker guns
赫克托号	ss. Hector
河台	Ho-tai

黑发之民	the black-haired race
湖北、湖南两省总督	Viceroy of Hu-peh and Hu-nan
江宽号	ss. Kiang Kivan
救世真主	"The True Saviour of the World"
炕	nikang
客堂	ka-dong
蓝顶武官	military blue-button rank
龙舟节	Dragon-boat Festival
论重生	"On Regeneration"
伦敦会 / 伦敦传道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论复活	"On the Resurrection"
论悔改	"On Repentance"
论赎罪	"On the Atonement"
论真神	"The Truth concerning God"
罗汉像	Sohangs
罗马字母	Roman character

南京条约	treaty of Nanking
鄱阳号	Po-yang
赛曼法	Cymanfa
陕西	Shen-si
摄政会议	council of Regency
摄政王肃顺	SU-SHUN, REGENT OF CHINA.
师爷	pundit
售书员	colporteur
水手馆	Sailors' Best
太平军	Taipings
天津条约	Treaty of Tientsin
天路指南	"The Guide to Heaven"
维维安父子公司	Messrs. Vivian and Sons
为中国请命	A Plea for China
文理	Wen-li
文学硕士	Master of the Literary Essay
文职官员	literary Mandarin

希尼之地	Land of Sinim
先知小屋	prophet's room
小鲱鱼	sprats
行善不可丧志	Hope for China; or, Be not Weary in Well-doing
秀才	Sin-tsai
杨格非先生的名字之所以在中华帝国	the Celestial Empire
妖怪	Monsters
以便以谢教会	Ebenezer
英格兰和威尔士公理会联会	Congregational Union of England and Wales
应苏格兰圣经公会 / 杨先生与苏格兰圣经公会	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
玉皇	Yu-'hwang
至高的主宰	the Supreme Ruler
智慧之门	"Gate of Wisdom"

中国灯笼店	CHINESE LANTERN SHOP.
中国人的伦理——论性与罪之学说	"The Ethics of the Chines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Doctrines of Human Nature and Sin"
中国之诉求与呼召	China, her Claims and Call
总理衙门	Tsung-li Yamen

人名索引

中文	英文原名
阿诺德·福斯特夫人	Mrs. Arnold Foster
阿奇博尔德先生	Mr. Archibald
埃文·布赖恩特牧师	Rev. Evan Bryant
艾约瑟牧师	Rev. J. Edkins
艾约瑟牧师	Rev. Joseph Edkins
艾约瑟先生	Mr. Edkins
鲍祥生	Pau-seang-sang
比文牧师	Rev. Dr. Bevan

波拿博士	Dr. Bonar
布赖森先生	Mr. Bryson
布政使	Lieutenant Governor
曾执事	Tseng
陈玉成	Chin-Y-ching
传教士们受到忠王	Chung Wang
大卫	David
大卫·格里菲斯牧师	Rev. David Griffiths
冯先生	Mr. Fung
格里菲斯	Griffith
恭亲王	Prince Kung
关总督	Kwan
哈特韦尔先生	Mr. Hartwel
亨利·格里菲斯牧师教授	Rev. Professor Henry Griffith, F.G.S.
洪秀全	Hung-sew-tsuen
华中圣书公会	Central China Tract and Book Depot

华中圣书会	Central China Tract Society
皇太后	Empress-mother
街口礼拜堂	Kia Kiai Chapel
考克斯牧师	Rev. J. Cox
克里斯马斯·埃文斯	Christmas Evans
克洛克斯先生	Mr. Kloekers
孔子	Confucius
拉纳瓦洛纳女王	Ranavalona
拉纳瓦洛纳女王	Queen Ranavalona
朗费罗	Longfellow
老汤姆琴酒	Old Tom
里德医生	Dr. Reid
李秀成	Li-sen-cheng
连大人	Lien
联合礼拜堂	Union Chapel
伦敦会	London Mission
罗伯特·麦克斯韦先生	Robert Maxwell

洛克哈特医生	Dr. Lockart
卢向阳	Lo Hiang-Yung
玛格丽特·简·格里菲斯小姐	Miss Margaret Jane Griffiths
马可·波罗	Marco Polo
玛丽	Mary
麦都思牧师 / 麦都思博士	Dr. Medhurst
麦肯齐医生	Dr. Mackenzie
梅福 / 美福	Mei-foh
美国监理公会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of America
米切尔号	On Hamilla Mitchell
穆伦斯牧师	Rev. Dr. Mullens
大卫·格里菲斯牧师	Rev. David Griffith
慕维廉牧师	Rev. W. Muirhead
慕维廉先生	Mr. Muirhead
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

纽约世界传教士评论	New York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秦桧	Tsing-keno
取名阿瑟·格威廉	Arthur Gwilym
屈原	Keu-Yuen
任吉甫	Jeu-ki-pu
僧王	Sung "Wang"
沈子星	Shen-tsi-sin
沈子星	Shen Tsi-Sing
沈子星	Shen-tsi-sing
水手之友	The Sailors' Friend
说那人是天主教徒	Roman Catholic
斯帕汉姆牧师	Rev. C. G. Sparham
四眼狗	Sz'-yan Kow
苏东坡	Su-tung-p'o
苏格兰国教会	Established Church of Scotland
肃顺	Su-Shun

他曾大败金兵	Kiu Tartars
他曾受理雅各博士	Dr. Legge
他们也想了解大沽炮台	Taku Forts
太平天国之乱	Taiping Rebellion
天福	Tien-fuh
天王	Heavenly Monarch
同行的有吉利森医生	Dr. Gillison
托马斯医生	Dr. Thomas
托马斯·布赖森牧师	Rev. Thomas Bryson
王建堂	Wang Kien-tang
王某	Wong
王爷	Wang-yay
威尔逊牧师	Rev. E. Wilson
威尔逊先生	Mr. Wilson
卫斯理公会汉口区议会	Wesleyan Hankow District Committee
威斯敏斯特礼拜堂	Westminster Chapel

锡安堂	Zion House
希勒医生	Dr. Shearer
咸丰	Hien-fung
幸得合信医生	Dr. Lockhart
秀才	Elegant Talents
宣教工作的属灵能力	Spiritual Power for Missionary Work
寻到布道所	Mission Chapel
雅各布牧师	Rev. E. Jacob
雅各布先生	Mr. Jacob
杨夫人	Mrs. John
杨格非	Griffith John
杨格非牧师	Rev. Griffith John
杨格非先生	Mr. John
杨先生	Yang-sian-sang
怡亲王、郑亲王	princes of I and Ching
英国各圣经公会	British Bible Societies

余吉方	Yu-ki-fang
岳飞	Yo-lan-ye
约翰·肯普·韦尔奇先生	John Kemp Welch
约翰·威廉姆斯先生	Mr. John Williams
约西亚·琼斯牧师	Rev. Josiah Jones
詹金斯夫人	Mrs. Jenkins
詹金斯牧师博士	Rev. Dr. Jenkins
字林西报	North China Daily News

地名索引

中文	英文原名
阿伯拉曼	Aberaman
安南	Annam
八字桥	Pa-ch-ih
贝德福德	Bedford
北京	Peking
渤海湾	Gulf of Pechele

蔡甸	Tsai-tien
菜市口	Cabbage Market
沧州	Tsan-chew
长江	the great River Yang-tsi
长沙	Chang-sha
常州府	Chang-chew fu
成都	Chung-tu
成都	Cheng-tu
重庆府	Chung-Kiang-fu
楚国	Tzoo
大运河	Grand Canal
丹徒	Tan-tu
丹阳	Yan-yang
德安	Teh Ngan
府河	Fu Ho
戈尔孔达	Golconda
观音阁	Kwan-yin Kian

广州	Canton
汉江	Han
汉江	the Han river
汉江	Han River
汉口	Hankow
汉阳	Han Yang
汉阳	Han-Yang
汉阳府城	departmental city of Han-yang
汉中府	Han Chung-fu
杭州	Hang-chow
黑伊	Hay
红海	the Red Sea
湖北	Hu-peh
湖南	Hu-nan
淮安府	Hwai-ngan-fu
黄河	Hwang
黄州	Hwang-Chew

嘉善	Kia-shan
嘉兴	Kia-hing
江苏省	Kiang-Su
江西	Kiang-si
江阴	Kiang-yin
净慈寺	Tsing-tsel-zz'l
景德镇	King-teh
利物浦	Liverpool
梁河口	Liang Ho K'eu
亭子	Tang-tsi
林村	Lin village
灵隐寺	Ling-zin
泸州	Loo-chow
马达加斯加	Madagascar
马基纳莱斯	Machynlleth
马赛	Marseilles
缅甸	Burmah

岷江	Min
南昌	Nan-Chang
南京	Nanking
齐家八道	"Teaching the Family in the Eight Way"
清江	Tsing-kiang
清江浦	Tsing-Kiang-fu
求福真道	"The True Way of Seeking Happiness"
上海	Shanghai
四川	Si-chuen
斯旺西	Swansea
松江	Sung Kiang
松江大城	Swong Kong
松江府	Sung-Kiang-fu
苏州	Soochow
天竺寺	Tian-tso
魏村	Wei village
威尔士	Wales

翁卢因	Onllwyn
武昌	Wuchang
西湖	Si-hu
湘潭	Siang-tau
孝感	Hiau-kan
新加坡	Singapore
浒墅关	Hiibz-Gwan
扬子江	Yang-tsi
宜昌	I-Chang
镇江	Chun-Kiang
重庆	Chung-Kiang

